

東漢西嶽華山廟碑（馬氏小玲瓏山館本/順德本） 冊頁，拓本十三開半，題篆及題跋等共九開半，雙鉤補摹四開，墨紙各約25x17.6釐米，宋拓。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館藏編號1973.0687 北山堂惠贈

臺灣大學 期刊資料庫



李嘉福舊藏《散氏盤》拓片 94x44釐米 西泠拍賣公司提供圖片

臺灣大學

DOI: 10.6541/TJAH.2017.03.42.03

拓本流通與晚清的藝術和學術

白謙慎*

【摘要】本文討論晚清拓本流通（circulation）的基本方式：如贈送、市場買賣、交換、集資訪拓等。本文指出，晚清的這些拓本流通方式，使得金石學學者們得以跨越地域的限制，在更廣大的範圍內收集金石拓片。金石拓片製作與收藏規模的大幅度提升，也對碑學書法在晚清的興盛和金石文字之學的新突破，提供了物質文化的基礎。

關鍵詞：拓片流通、訪碑、拓碑、碑學書法、文字學

本文討論晚清拓本流通的基本方式和規模。晚清拓本流通（circulation）有以下幾種方式：贈送、市場買賣、交換、集資訪拓等。① 在討論流通規模時，本文試圖從晚清文人收藏拓本的廣度和深度出發，來討論拓本與當時的藝術和學術活動的關係。

一、作為禮品的石刻拓片

自從金石學在宋代成為獨立的學術領域後，金石拓片就成為歷代文人的收藏對象。金石學在清代進入鼎盛時期，訪碑、拓碑、鑒賞拓片、通過拓片來研究金石文字，與考據學、音韻學、文字學匯為當時的學術主流。青銅器可以搬動，出土後，多進入藏家之手。而碑刻則不易移動，多留在原地，或移入當地的學宮與寺廟保存，繼續與特定的歷史時間和地理空間聯繫（摩崖刻石更是如

*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 教授

① 關於晚清的拓本流通，研究晚清金石學的著作常有涉及。任曉煒的碩士論文辟有「碑帖的流通」一章，專門討論晚清金石學家葉昌熾購買及友人相贈的碑拓。參見任曉煒，《緣督廬中的金石世界》（杭州：中國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09），頁69-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成為一個地區的歷史文化遺產。正因為如此，許多地方志都有專門章節著錄本地的古代碑刻。在交通遠不及今天發達的古代，一些邊遠地區的拓片在文人中的流通數量也會相對稀少。由於晚清的京師聚集著大量喜歡收藏金石的官員和文人，許多晉京述職的地方官和進京赴考或求師訪友的士子，爭相以當地的碑刻拓片作為特殊的「土產」，贈與京師的官員和文人。晚清金石學家葉昌熾（1849—1917）在《語石》一書中，曾生動地描述各地拓片匯聚京師的情形：

> 四方珍奇之貨，聚於輦轂。珠璣象貝，不脛自至，惟碑亦然。疆臣述職而來者，舉子之與計吏偕者，選人之赴部者，騷人墨客游食於茲者，莫不攜其鄉之名跡，以當羔雁。故有窮荒絕徼、著名難得之碑，廠肆時或見之。余在羊城，欲求東莞資福院石塔及乳源雲門寺南漢兩碑，懸金以購，皆不可見。先後於廠肆遇之。張丹叔中丞撫粵西，其子幼丹司馬拓《智城山碑》見貽，以為至寶。後在廠肆見一本，有陳恭甫手跋，即載於《左海集》者也。去歲避地歸，又以百錢得一通。他如《南詔德化碑》、西夏《感通塔碑》，鄉曲好古之士，遠莫能致者，屢見不一見矣。故欲網羅古刻，非至都門，終為坐井觀天。②

按照葉昌熾的說法，尋找偏遠地區的碑拓，在當地的省城反而不如在京師方便。增補《語石》並述異同的柯昌泗（1899—1952）也說：「寰宇石墨，自來萃於北京。……士大夫既屢有集貲拓碑之舉，碑販亦往來奔走，每遇新品，必致都下。」③ 也就是說，京師是碑拓最大的聚散地。

上引葉昌熾的描述也可以從長期在京師任官的翁同龢（1830—1904）的日記中得到印證。翁同龢喜收拓片，他的日記多次記載了他人贈送拓片之舉。如光緒九年（1883）五月十七日：「吉安府鍾珂（號叔佩，三，壬午年伯松福子，柏師堂侄）來見，送物，受……《瀧岡阡》墨拓二張。」④《瀧岡阡表》

② 葉昌熾、柯昌泗，《語石、語石異同評》（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71。
③ 葉昌熾、柯昌泗，《語石、語石異同評》，頁72-73。
④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上海：中西書局，2011），第4卷，頁1786-17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歐陽修的名作，碑在江西省永豐縣，正在吉安府轄內，可見，吉安的地方官把當地的拓片作為送給京官的禮物。

光緒十一年（1885）四月廿二日，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長少白送物，受《沙南侯碑》（甚清楚）、《天山碑》、地毯一張。」⑤ 長少白即長庚（1843—1915），曾任伊犁將軍，戍守新疆四十年。他贈送的《沙南侯獲碑》和《天山碑》（亦即《姜行本紀功碑》）拓本，原石都在新疆巴里坤（當時隸屬甘肅），清代中期才出土，因地處邊陲，拓片多為當地的軍人所製，不易得到。長庚也就以這兩塊碑的拓本和地毯（產地當為新疆）一起作為送給翁同龢的禮物。

同年七月十一日，翁同龢的日記記載：「辛亥世侄沈炳奎（號星府，常州人）來見，其人久在河南作幕，求為說項也，允之。（贈余洛陽布二匹、龍門碑數張，《入洛集》一本，即陸吾山在河南府時作）。」⑥ 翁同龢友人的兒子沈炳奎在河南洛陽作幕僚，進京托翁辦事，送的禮物都和洛陽有關，洛陽龍門石刻拓片也成為當地的土產。

翁同龢是位居中樞的高官，向其送拓片的地方官自然會多些。但我們可以推測，各部院的中級、低級官吏，大概也能得到類似的禮物，⑦ 或是從市場上購得由禮品轉變為商品的拓片。

由於京師是當時最大的拓片聚散地，很多文人也在任官或訪問京師期間搜羅拓片。晚清最重要的石刻拓本收藏家沈樹鏞（1832—1873）在1870年跋自藏《爨寶子碑》拓本時寫道：「石在黔中，拓本甚不易得，同治癸亥冬在都門遍求始得之。韻初記。」「此原石真本。甲子、乙丑在京都有懸巨直購此碑者。及丁卯再入都，則廠肆有重刻本矣。形模畢肖，惟剝蝕處皆剜鑿耳。同治庚午

⑤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5卷，頁1977。

⑥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5卷，頁1995。

⑦ 贈送有地方特色的拓片，不獨為京師現象。莫友芝日記記載，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初十日，「適日照許印林（瀚）之子至，以沂州《伏羲授經畫象漢石》拓本致儉老，因乞得一紙，劇談至二更乃還舟。」（莫友芝著、張劍整理，《莫友芝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頁167。）日照即在沂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九月鄭齋附記。」⑧

京師有時還會有舊家的整批拓本轉讓，莫友芝（1811—1871）在其同治六年（1867）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寫道：「潘季玉招午飲，晤沈韻初，言其在京收穫劉燕庭所藏碑版二千稿，甚巨觀，可羨也。」⑨ 劉燕庭即晚清金石大收藏家劉喜海（1793—1853）。他去世十多年後，所藏碑帖被沈樹鏞在北京整批買去。

其實，晚清的很多金石學者和收藏家都有在京師收羅拓片的經歷，不但莫友芝、沈樹鏞如此，繆荃孫（1844—1919）、葉昌熾等的碑帖收藏，也或多或少地依賴在京師居住期間的搜羅。⑩

二、晚清的拓片市場

各地送往北京的拓片，喜好的官員可能就收留下來。但也會有一些並無此好、或家中已有相同石刻拓片的官員，可能會把一些拓片售給文物商，各地入京的拓片便源源不斷地流向古董商的聚集地琉璃廠。

晚清市場上的拓本價格差別非常大。經由名家題跋的稀有著名舊拓，價錢可以高達數千兩銀子。新製作的拓片，價格通常不高。如是新出之品的初拓、著名石刻的精拓，價格可能稍高；而名氣不大的石刻拓片，可能半兩銀子都不到。價格上的巨大差異，使得京師的官員能夠根據自己的喜好和能力來選購拓片，大量收入不高的低級官吏也能參與其中。除了京師，山東和江南等地的拓片市場也非常活躍。

---

⑧ 上海圖書館藏沈樹鏞《漢石經室金石跋尾》（稿本）。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於2012年出版了此書的整理本，據其整理前言所云，乃據後來吳湖帆整理的《鄭齋金石題跋記》等增補刪潤。此處引文的「黔」，在吳湖帆整理本作「滇」，以《爨寶子》《爨龍顏》皆在雲南而非貴州。見何紹基、沈樹鏞，《〈東洲草堂金石跋〉〈鄭齋金石題跋記〉》（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頁39。

⑨ 莫友芝著、張劍整理，《莫友芝日記》，頁225。

⑩ 參見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和江標的《笘誃日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稿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閣帖》與其他刻帖的市場行情

當北宋的文人開始收藏和研究金石拓片時，由皇家於淳化三年（992）贊助摹勒的《淳化閣帖》（下文簡稱《閣帖》）也開啟了刻拓叢帖的傳統。從翁同龢及其友人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晚清的拓片市場上，舊拓《閣帖》的價格最高。⑪

⑪ 由於下文將涉及拓本在晚清市場的價格問題，有必要在此對晚清的幣制和物價做一簡要介紹，使讀者對拓片的貴與賤有個參照指標。晚清幣制比較複雜，除了通行的銀兩和銅錢外，還有銀元。銀元和銀兩的比價相對穩定，一個銀元約合0.7兩銀子。錢則比較複雜，因為有多種稱為「錢」的通貨。晚清（特別是光緒以後）的銀兩與銅錢的比價一直變動，這點在李慈銘（1830—1894）的日記中多有反映。（參見張德昌，《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0〕，頁233-244。）本文所引碑拓價格，多用銀兩和銀元計算，涉及銅錢的不多，如上引葉昌熾所說的「以百錢得一通」《智城山碑》這一條。這「百錢」如果是「制錢」的話，這通拓本的價格不到0.1兩銀子（當時一兩銀子約兌1760文制錢）。翁同龢在1875年，花了四百兩銀子從琉璃廠購買了王翬的《長江萬里圖》長卷，這筆錢本是準備用來購買住房的。（參見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3卷，頁1160、1164、1165、1166，1168。）由於翁已是政府高官，我們推想，他當時能用四百兩在京城購得一處體面的普通四合院。1876年，盛康（1814—1902）在蘇州以五千六百五十兩買下著名的園林——留園（參見顧文彬著，蘇州市檔案局、蘇州市過雲樓文化研究會編，《過雲樓日記》〔上海：文匯出版社，2015〕，頁392）。最珍惜昂貴的拓本的價格可以和當時這些地產的價格做一比較。那些普通的拓本則可以同日常生活用品相比，以顯其價格之廉。研究晚清京師物價的邵義先生曾這樣寫道：「在清朝京師，小民的日常交易金額在12文製錢以下的數目甚多。比如：一斤菜值二、三文製錢，一個雞蛋賣三文製錢，一塊燒餅和一個菜包子各值兩文製錢，茶館的茶資為二文製錢等等。」（參見邵義，《過去的錢值多少錢？——細讀19世紀北京人、巴黎人、倫敦人的經濟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176）。如此推算，那張值「百錢」的拓片相當於50個菜包子。對普通民眾來說，不算便宜；對官員來說，不算昂貴。接下來的問題是：當時京師的官員的收入如何？關於晚清京官收入的研究，近五十年來成果不斷。早期的以張德昌先生的《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最為具體而著名。近年的研究中，張宏傑先生的《給曾國藩算算帳：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京官時期）》（北京：中華書局，2015）最為深入。無論是專書還是論文，學者們都指出了，京官的俸祿很低，除了一些補貼外，他人的饋贈和外地官員的各種「敬」成為重要的收入來源。由於非制度性和穩定性的收入佔據重要的份額，同級官吏的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翁同龢光緒三年（1877）五月初六日日記記載：「以八十金購舊拓《閣帖》十冊」。⑫ 這在當時算是相當便宜的。由於我們不知拓本舊到何時，無從判斷為何如此便宜。

光緒七年（1881）三月十二日，翁同龢「赴蔭軒之招，陪張子青、李蘭生觀《閣帖》三冊，即今正所見山東人持來索八千金者也，余不謂然，而李相頗矜許。」⑬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古董商開價往往會比最後的成交價高出許多，兩者的差別有時可以是接近一倍乃至數倍。次年（1882）正月十八日，翁同龢又見《閣帖》十本，「索重值，可笑」。⑭

光緒九年（1883）正月，久居京師的蘇州籍大收藏家、時任禮部尚書的潘祖蔭（1830—1890）的父親去世，四月，潘祖蔭護送父親的靈柩回蘇州埋葬並在那裡守喪。守喪期間，潘祖蔭和蘇州的收藏家互動密切，在致友人的信中，潘祖蔭寫道：「此地沈、顧、李皆大有力。沈以千金得項氏《閣帖》，以二千金得陳眉公之《閣帖》（即前年在京者）。」⑮ 「沈」即沈秉成（字仲復，

體收入多少經常取決於官員的職位、人脈、手段和廉恥觀（願不願意、敢不敢索要或收受各種「饋贈」），很難找出一個定律。以李慈銘為例，根據張德昌先生的統計，李在光緒元年（1875）至光緒九年（1880）的年收入總在四百餘兩至九百餘兩之間；光緒十年（1884）後，超過一千兩，收入上較大幅度的上昇是在他於1880年成為進士後。前此，他在京師的官位很低。不過，他在京師的文壇享有聲譽，這應能為他帶來額外的收入。如果李慈銘的收入可以作為參照的話，我們基本可以肯定，對於普通官員而言，購置價格不高的碑拓，應無問題。

⑫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3卷，頁1323。

⑬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4卷，頁1693。三冊閣帖開價八千，實在有些不可思議。為此，我於2013年10月20日專門寫信向翁同龢日記的收藏者和上海中西書局最新版本的校訂者翁萬戈先生請教，10月26日收到翁先生回信云：「關於光緒八年壬午三月十二日文恭所記，查出原文系『索八千金』，中西版第4冊1693頁無誤。中國所謂『獅子大開口』是也。」

⑭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4卷，頁1683。

⑮ 《潘文勤公書劄》（上海圖書館藏稿本），第22-23開。潘祖蔭說的「此地」，指蘇州。此冊信劄中的另一通提到，看吳雲的收藏要經其子吳廣禽同意。吳雲在1883年去世。信中的「李」指李鴻裔（1831—1885）。由於李鴻裔在1885年去世，所以這些信大約寫於1883年潘祖蔭剛到蘇州不久，因為此後潘祖蔭和李鴻裔在蘇州過從甚密，留下不少信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23—1895），湖州人，晚清活躍的收藏家，曾任上海道臺，1874年開始在蘇州賦閑，廣收金石書畫。他齋中的兩種《閣帖》，曾經項元汴（1525—1590）和陳繼儒（1558—1639）收藏，購入價格皆過千金，十分高昂。

翁同龢在1888年二月十二日「得見周芝臺相國所藏宋拓《閣帖》十冊，此王著本（每卷首有「臣王著模」四字），卅年前曾侍先公借看，彼時即知是明複本，今乃益知其謬（王世貞跋亦偽，惟每冊首行行書一行，似弇州所題）。另冊題跋中，何子貞七古一首最奇妙（索三千金，可笑。）舊家零落，可悲也」。⑯ 周芝臺即周祖培（1793—1867），官至大學士，是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1791—1862）的同僚。倒推三十年，是時翁同龢尚不足三十歲，就曾向父執借觀，並判斷為明朝的翻刻本而非宋拓。古董商開價三千兩銀，翁同龢認為太可笑。但昔日大臣的舊藏流入廠肆，又令他發出「舊家零落，可悲也」的感歎。

翁同龢在1890年三月十一日，「見宋拓《閣帖》六、七、八三冊，何瑗物，經邢子願、張東海、馮益都收藏，紙墨古，筆劃沉厚，尤物也，德寶齋索千二百」。⑰《閣帖》三冊，殘缺不全，但經由張弼（1425—1487）、邢侗（1551—1612）、馮溥（1609—1691）遞藏，索價一千二百兩。

上引翁同龢、潘祖蔭1877—1890年關於《閣帖》的記載，分別為：《閣帖》十冊，八十金（1877）；《閣帖》三冊，索八千金（1881）；項元汴舊藏《閣帖》，一千金；陳繼儒舊藏《閣帖》，二千金（約1883）；周祖培藏《閣帖》十冊，索三千金（1888）；宋拓《閣帖》三冊，索一千二百金（1890）。除了翁同龢本人購入的《閣帖》為八十金，其餘實際購買價和索價均超過一千金，甚至高達八千金，遠遠高於當時一般青銅器和書畫的價格。⑱

⑯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5卷，頁2221-2222。

⑰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5卷，頁2399。「何瑗」為誰不詳。或為晚清收藏家何瑗玉之誤。

⑱ 關於晚清文物的價格的討論，讀者可參閱白謙慎，〈晚清文物市場與官員收藏活動管窺：以吳大澂及其友人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第33卷第1期（2015年秋），頁399-4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其他的刻帖則沒有這樣昂貴。光緒十五年（1889）九月初七日，古董商送「寶晉齋殘帖（宋拓）」至翁同龢家中。六天後，翁「以七十元買《寶晉帖》，可謂好事」。⑲《寶晉齋法帖》為南宋曹之格輯刻的晉人和米芾父子書法的叢帖。翁同龢所購，雖為宋拓，但有殘缺，所以七十元（約五十兩）成交。這一價格不算過廉，但比起同為殘缺的三冊《閣帖》，價格上尚有很大的差距。

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初四日，翁同龢「到廠得《渤海藏真》殘本（六金）」。⑳《渤海藏真帖》乃明末的一部叢帖，翁同龢以六金得之，有兩個原因：一是殘本；二是此時太平天國剛剛被剿滅，戰亂後古董的市場價格不高。所以，即便不是殘本，在1860年代，它的價格也不會太高。

我們不妨與另一部明末涿縣馮銓（1519—1672）刻的《快雪堂法帖》做一比較。光緒丙戌（1886）十月廿一日，葉昌熾「出署閒步，先觀拓本《快雪堂帖》，索二十金」。㉑ 可以推想，二十金以下應可拿下。需要說明的是，此時葉昌熾正在廣東學政汪鳴鑾的幕府，廣東的拓片價格或與京師有所不同。

（二）碑刻拓片的價格

晚清碑刻拓片市場的價格，㉒ 遠比刻帖複雜。以數量而言，碑刻遠遠多於刻帖。同一塊碑的拓制時間可能既有古代，也有當下。在尺寸大小上也比經折裝式的刻帖要多樣化。拓本的價格與所拓碑刻的地理遠近、捶拓難易程度（近世拓本）、碑刻本身之學術、藝術價值也有關。所以，碑刻拓片的市場價格差別會更大。

從中國石刻的歷史來看，先秦和秦代的刻石並不多，真正碑碣雲起的時代是漢朝（特別是東漢晚期），雖然經過了歷代戰爭、自然災害和人為損害，但在清代，依然有遠遠多於秦代以前石刻的漢代碑刻和摩崖存世。它們的文本

⑲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5卷，頁2352-2353。
⑳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2卷，頁532。
㉑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第2冊，頁1224。
㉒ 此處所用「碑刻」一詞乃泛稱，包括各種石刻（有些並非石碑）文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長，風格各異，有成為後世書法典範的可能性。但在宋代和明代中期以前，中國文人們雖然收藏漢碑的拓本，但很少直接取法漢碑。這一狀況在明末清初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書法家們開始提倡追本溯源，學習篆隸，而隸書的典範，也不再是唐代以來的隸書，而是漢隸。㉓ 在他們的提倡下，漢隸名品的概念逐漸形成。朱彝尊（1629—1709）一段廣為引用的文字，可以被視為清初人對漢碑名品的概括：

>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勅》《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宙》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山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為漢隸第一品。㉔

雖說其他的書法家可能會對何為漢碑第一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但朱彝尊所列漢碑，卻是清代書法家公認的名碑，而《華山碑》在其中則始終居於重要地位。但是，這塊漢碑的原石在明代已毀，宋拓本在清代僅有四本傳世，被收藏界視為珍奇。

同治七年（1868）六月廿八日，翁同龢「於樹南蘭室中得見崇制軍所藏《華山碑》整本裝軸，約高六尺，寬三尺許，首五行缺數十字，雙鉤補足，四邊綾上多名公題識，此本海內第一，無意中獲觀，欣幸欣幸。（覃溪跋中有「圭」字分兩截云云）。此天一閣本，阮太傅所藏，後質五百金於崇氏」。㉕ 十二天後，亦即七月初十日，翁同龢「詣延樹南處再觀四明本《華山碑》」。㉖ 延樹南即延煦（？—1887），愛新覺羅氏，直隸總督慶祺子，咸豐進士，官禮部尚書。崇制軍即完顏崇實（1820—1876），四明本《華山

㉓ 參見白謙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第三章；薛龍春，《鄭簠研究》（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7）。

㉔ 朱彝尊，〈跋漢華山碑〉，《曝書亭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卷47，頁7a-b。

㉕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2卷，頁652。

㉖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2卷，頁655。翁同龢見到的四明本《華山碑》，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碑》於1859年歸其所藏，㉗ 價格五百金。

1871年二月，晚清蘇州大收藏家顧文彬（1811—1889）在杭州至梁恭辰（敬叔）之寓，與友人「同觀其碑帖書畫各件，約二十種，以《西嶽華山碑》為最。碑共十九開，跋廿九開，皆明人及國初人。明人中以錢牧齋、王覺斯兩頁為尤勝，皆精楷，據敬叔云，得價三千金。」㉘ 從顧文彬的描述來看，梁恭辰所藏應為華陰本《華山碑》，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梁恭辰是清代中晚期的著名文人梁章鉅（1775—1849）的第三子。他所收藏的華陰本《華山碑》，是由他的父親在1836年在北京與廣東洋商爭奪後購得。《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收有梁章鉅本人的題跋，描述了購買這一拓本的過程：

> 道光丙申，余由甘藩擢桂撫，入覲京師。將出京，云臺師忽告余曰：「昨聞關中本《華山碑》現將出售，似應歸君，其勉為之。」余聞議價甚昂，且已為粵東洋商者所物色，恐大力者負之而趨矣。而阮師屢來偵問，不忍負吾師之意乃破慳以重值得之。洋商聞之大詫。蓋有稍縱即逝之機，以余之勇決故轉手者無所施其狡獪耳。冊中本有吾師舊題字，於是呈之函丈復綴數語，匆匆數日即挾之出京。……聞余出京後，竟有以此事登之彈章者，意欲以豪侈相齮齕。幸荷聖明，置之不問，又不勝悚感交深云。㉙

跋中所言「云臺」即乾嘉大儒阮元（1764—1849）。梁章鉅是在阮元的鼓勵和督促下，與洋商爭奪，高價購得此拓本。雖然跋中未提「重值」究竟若何，我們從上引顧文彬的日記得知，「得價三千金」。如果這一描述沒有誇張的話，㉚ 三千金確是一筆鉅款，難怪梁章鉅為此被人上章彈劾，好在皇上沒有

㉗ 參見施安昌編著，《漢華山碑題跋年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24。

㉘ 顧文彬著，蘇州市檔案局、蘇州市過雲樓文化研究會編，《過雲樓日記》，頁96。

㉙ 梁章鉅，《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收入盧輔聖等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第9冊，頁1003。

㉚ 之所以在此提出這一價格是否誇張是因為，從顧文彬此後的日記可以看到，梁家在賣家藏書畫給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深究。梁章鉅出此鉅款購一名拓，當然是和洋商競爭的結果，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當時的市場價格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它至少說明，名碑的舊拓可以賣到天價。不過，這是太平天國爆發之前的一個成交價，此後是否還能賣到這個價格，仍是一個疑問。

1872年，亦即顧文彬見到華陰本《華山碑》的兩年後，晚清另一位重要的金石收藏家、翁同龢的同僚李文田（1834—1895）也購得了一本宋拓《華山碑》。李文田的門人江標（1860—1899）在其光緒十五年（1889）二月初七日日記中寫道：「宋拓《華山碑》，舊為馬二查舊物，後歸陽城張古餘之子，今張家出售，歸芍師（筆者按：指李文田），以三百金得之。有孫淵如、龔定庵諸老題跋。」㉛ 李文田為廣東順德人，所藏《華山碑》被稱為順德本。（彩圖）李氏於1872年在江西購得此碑，「三百金」云云，初見於李文田本人的1873年十月的題跋。㉜

崇實在1859年以五百金購四明本《華山碑》，李文田於1872年以三百金購順德本，這在晚清（1840—1911）已算是碑刻拓本的最高價。但是，古董價格在晚清市場的快速上漲，恰恰是在1872年以後。這既有戰後經濟恢復的原因，也可能有國際市場銀價變化的因素。㉝ 所以，如果李文田在此後購得這一名拓，價格很可能會高出許多。

《華山碑》上題跋累累。晚清金石學學者楊守敬（1839—1915）在致繆荃孫的信劄中專門談到了提升古董身價的方法，其中包括題跋：

> 尊藏海內稀有之本，固有《藝風碑目》可考，然非專門金石家所能洞悉，則何如普示天下學者，或石印或雙鉤（費皆敝處任之）。必有題跋，溯所從來，聲價必當愈增。即如莫氏之唐本《說文》，若非子偲先生刻之木，徐子靜肯以千五百金購之乎！前年在金陵署中見墨本，則又增價三千金矣。㉞

㉛ 江標，《笘誃日記》。

㉜ 施安昌編著，《漢華山碑題跋年表》，頁24及附錄142號題跋。

㉝ 參見白謙慎，〈晚清文物市場和官員收藏活動管窺〉，頁410-413。

㉞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下冊，頁6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按照楊守敬的說法，拓本聲價的提高，和題跋、雙鉤、刊刻、或石印有關。莫友芝所藏唐寫本《說文解字》正是因為被刻版印刷後，廣為流傳，學術價值被充分認識，身價倍增。這裡涉及到兩個方面的工作：其一，有研究性的題跋所呈現的文物價值；其二，出版印刷所起的推廣作用。㉟

順德本《華山碑》在1872年入李文田手之後，也開始了新的學術之旅。李文田是晚清重要的金石學家。他得到《華山碑》拓本後，攜之與其他三本仔細校對，並將校對結果一一批註於順德本的裱邊。他不但自己多次題跋，還請趙之謙（1829—1884）、潘祖蔭、王懿榮（1845—1900）、沈秉成等學者和收藏家題跋。㊱ 雖說這更多的是知識上的追求，但「必有題跋，溯所從來，聲價必當愈增」，亦必是李文田的考慮之一。

不過，尋常的漢碑拓片（如果不是宋元拓本），價格要比《華山碑》低許多。沈樹鏞跋《乙瑛碑》云：「此碑百年前舊拓本。同治戊辰（筆者按：1868）二月廿二日得於都門廠肆，系毛子銘物。毛君浙之吳興人，以微員官畿輔。喜藏石刻拓本，而奇窮至不能度日，以此出售，因與白金三兩得之。」㊲《乙瑛碑》也是漢隸名碑，沈樹鏞買的是清拓本，只花了三兩銀子。

同治八年（1869）三月十八日，翁同龢「得見繆鴻初所藏《百石卒史碑》（筆者按：亦即《乙瑛碑》），似元拓本，泐損與今同，而神理古厚，索三百金，一笑還之」。一個月後，翁同龢「購得繆鴻初所藏《百石卒史碑》，價廿六金，殘失卅一字」。㊳ 如果翁同龢購買的就是三月十八日見到的繆鴻初所藏的《乙瑛碑》的話，那麼，成交價「廿六金」不到一個月前古董商索價的十分之一，當是討價還價的結果。不過，與沈樹鏞的三兩銀子買的清拓本，翁同龢的「元拓本」還是貴了不少。

在翁同龢的日記中，不乏討價還價的例子。同治六年（1867）正月十四日，翁同龢「與兩侄游廠，……《禮器碑》稍舊，沈文忠物，即去歲所見，索

㉟ 石印法在19世紀傳入中國後，已被一些學者（如吳大澂）作為推廣自己的學術成果的方法之一。

㊱ 施安昌編著，《漢華山碑題跋年表》，頁24-26。

㊲ 沈樹鏞，《漢石經室金石跋尾》（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㊳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2卷，頁715、7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金」。次日，翁同龢出價：「《韓勅碑》（筆者按：即《禮器碑》）予直三金不售，還之。」[39] 這段記載十分有趣，曾任兵部尚書、軍機大臣的沈兆霖（諡文忠，1801—1862）舊藏的《禮器碑》，古董商索價四兩，翁同龢還價三兩，翁同龢覺得不值，為了這一兩銀子，翁同龢決定不買了。可見，官員在買古董時，也「錙銖必較」。類似的例子還有：同治八年（1869）四月廿六日，翁同龢「冒雨出東華門，過廠肆，與賈人論漢碑價，極饒舌」。[40]

1867年，一本稍舊的《禮器碑》拓本僅四金。《禮器碑》也是漢碑之名品，與《華山碑》齊名。但與宋拓《華山碑》的的價格差異巨大。

以上所談皆為漢碑。漢以後的碑刻拓本的價格又如何呢？

也就在決定不買沈兆霖舊藏《禮器碑》一個月後（1867年二月廿一日），翁同龢「還《聖教序》（曾筥巢物，六十金）及隋碑」。[41] 曾筥巢即曾協均（1821），江西南城人，乾隆朝兩淮鹽運史、貴州巡撫曾燠（1759—1831）之子，也是晚清一位活躍的收藏家，[42] 翁同龢並沒說褚遂良的《聖教序》是何時的拓本，但索六十金，實在不低。

同治九年（1870），顧文彬在北京任官，他在五月二十日的日記中寫道，他在琉璃廠「見宋拓《定武蘭亭》卷，笪江上藏本，後歸高江村，稀世物也，索價百金，急攜之歸，志在必得。」[43] 作為一個資深的收藏家，顧文彬深知這一曾經笪重光（1623—1692）和高士奇（1645—1704）這兩位清初大收藏家收藏過的宋拓《定武蘭亭》的價值。八天後，顧文彬和古董商議定價格。他在日記中寫道：「與論古齋議定宋拓《定武蘭亭》卷、王石谷《十萬圖》冊，價銀八十兩。近日快心之事，除軍機進單外，此事為最。然進單一節尚屬分內之

---

[39]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2卷，頁542。

[40]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2卷，頁722。

[41]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2卷，頁550。唐代碑刻中有褚遂良書《聖教序》和僧懷仁《集王聖教序》，由於後文引翁同龢日記曾提及「王《聖教》」，所以，為注明「王」者，權作褚書《聖教序》。

[42] 參見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第12冊，頁1062。

[43] 顧文彬著，蘇州市檔案局、蘇州市過雲樓文化研究會編，《過雲樓日記》，頁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此則得之意外者。平心而論，即石谷冊已值此數，《蘭亭》卷只算平空拾得，論此卷價值，即三百金不為貴也。」㊹

而顧文彬能在1870年以很低的價格購入宋拓《定武蘭亭》，或許和清廷平定太平天國和捻軍不久，戰後的古董市場剛開始復蘇有關。大約在1873年以後，晚清的古董市場價格開始迅速上升，類似的「撿漏」機會大概越來越少了。顧文彬光緒五年（1879）二月十八日日記中記載，「李香巖招集網師園，同席者少仲、愉庭、仲復、養閑。見香巖新押之宋拓《醴泉銘》，每頁有翁覃溪精楷邊題。此帖數年（前）曾有人持來求押，許以五百金未成。此外尚有宋拓《聖教序》，王石谷《趨古冊》，石濤山水冊，張得天、陳香泉兩字冊。共押千金」。㊺《醴泉銘》是唐初大書家歐陽詢所書名碑，此冊為宋拓，且有乾嘉時期的著名金石學家翁方綱（1733—1818）的題跋。大約在1875年（1879的數年前）有人向顧文彬求押，顧文彬出五百金居然未成。除去王翬、石濤、張照、陳奕禧的書畫，㊻ 宋拓《醴泉銘》和《聖教序》，大約可押六七百金。可以推想，一個著名唐碑的宋拓本可與1872年李文田購買的順德本《華山碑》（宋拓）匹敵。

光緒七年（1881）正月廿五日翁同龢的友人「燮臣來看《皇甫碑》，從德寶齋借來，楊又雲物，索二百五十金」。㊼ 燮臣即孫家鼐，晚清朝廷重臣（1827—1909），又雲即楊繼振（1832—1897），官至工部侍郎，收藏金石甚富，他收藏過的《皇甫誕碑》拓本，原石為歐陽詢又一楷書名碑，托古董商出售，索二百五十金，價格不低。

光緒十六年（1890）九月十九日，翁同龢「見宋拓王《聖教》，周櫟園舊物，歸英煦齋先生，索六百」。㊽ 曾經周亮工（1612—1672）與英和（1771—

㊹ 顧文彬著，蘇州市檔案局、蘇州市過雲樓文化研究會編，《過雲樓日記》，頁29。

㊺ 李軍整理，〈過雲樓日記〉，收入蘇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蘇州史志資料選輯》，第37輯（2011），頁96。顧文彬著，蘇州市檔案局、蘇州市過雲樓文化研究會編，《過雲樓日記》所記略有不同，「五百金」為「五百元」，見頁488。

㊻ 關於王翬等在1870年代的書畫價格，參見白謙慎，〈晚清文物市場和官員收藏活動管窺〉一文。

㊼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4卷，頁1685。

㊽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5卷，頁2441-24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40）收藏的宋拓《集王聖教序》索價六百兩。

張佩綸（1848—1903）1892年八月二十三日日記載：「永寶估郭、劉二姓來，留《道因碑》一本（「冰」「善」「逝」三字尚完），據稱宋拓，索二百金。」[49]《道因法師碑》乃歐陽詢之子歐陽通（625—691）的楷書代表作，張佩綸所見之本，「冰」「善」「逝」諸字尚好，如不是塗描的結果，當為善本，[50]故古董商開價二百兩。

從以上的例子來看，《定武蘭亭》、《集王聖教序》、歐陽詢父子的名碑、褚遂良書《聖教序》，如是經名家遞藏的宋拓或舊拓，市場價格都會比較高。此外，上述幾塊唐碑本身的書法地位也部分地成就了它們的市場價格。宋代以來叢帖中保存的王羲之書跡多為草書。《定武蘭亭》為行書，雖全篇僅三百餘字，但名氣最大。而懷仁的《集王聖教序》的字數則多得多，是學習王羲之行書最重要的典範之一。歐陽詢和褚遂良，不但自唐代以來就被奉為楷書大家。清代中期以後，成親王永瑆（1752—1823）開了學歐的風氣，[51]歐體成為官場重要的書樣。此後，晚清的黃自元（1837—1918）推波助瀾，使歐體風靡一時。

如果不是漢唐的名碑舊拓，一般石刻的拓本都相當低廉。沈樹鏞是晚清公認的石刻拓本大收藏家，卻英年早逝。他去世差不多20年後，他的兒子沈肖韻開始變賣父親的舊藏。葉昌熾在致繆荃孫的信箚中說：「聞沈韻初所藏劉燕庭拓本五千通，去其精者二千通，尚有唐、宋、元三千種在屺懷處，索價二千元，公其有意否？」[52]即使是劉喜海和沈樹鏞這樣的大藏家的舊藏，只要不是精品，三千種唐、宋、元拓本僅索價二千元，平均每件也就是半兩銀子左右。當然，這是「一攬子」買賣，價格優惠。

---

[49] 張佩綸，《澗于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1651。

[50] 關於此碑拓本的鑒定，參見仲威，《碑帖鑒定概論》（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頁200-202。

[51] 關於這一問題的最新研究，參見薛龍春，〈上圖藏阮元致陳文述十四箚考述〉（未刊稿），特別是文中關於第七箚的討論。

[52]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箚》，上冊，頁406。1896年冬月，繆荃孫在蘇州買下了劉燕庭舊藏拓本三千六百種（亦即沈肖韻出手的）。參見楊洪升，《繆荃孫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3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那麼，沈樹鏞的精品呢？沈肖韻開價：「《石經》孫本索二千金，《禮器》索千金。」[53] 孫承澤（1593—1676）研山齋舊藏漢《石經》宋拓本，是沈樹鏞的鎮齋之寶，他曾以「漢石經室」顏其書齋，並請好友趙之謙刻了一方印。這一名拓索價兩千，超過了三千種普通的唐、宋、元拓片的總和。

正因為普通碑拓並不昂貴，拓片收藏在晚清的官員和文人中有廣泛的參與。葉昌熾致繆荃孫劄云：「《蘭陵王碑》新從廠肆覓得全分，因有陰額，廠估甚為居奇，計直一金，即乞檢入為荷。」[54]《蘭陵王碑》全稱為《北齊蘭陵王高肅碑》。葉昌熾在琉璃廠買到的是一個有碑陰額的本子，因為罕見，所以花了一兩銀子，已屬「高價」購入。這裡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初拓、舊拓、名拓等稀有之品，或是經由著名藏家收藏的、有眾多名人題跋的新拓本，價格通常都不貴，一兩銀子都算是貴的。

以上的討論只涉及刻帖與碑刻的拓片，在晚清拓片流通中，還有為數可觀的青銅器拓片（包括全形拓），各種石刻拓片，陶文與封泥拓片等。

三、轉讓與交換

琉璃廠的古董商和文人之間的市場交易只是晚清拓片流通的一個途徑。在日常的收藏活動中，文人之間的有價轉讓和以拓片換拓片，也是常見的流通方式。

1876年冬，吳大澂（1835—1902）從擔任了三年的陝甘學政卸任，返回老家蘇州探親度假。次年正月初六日，吳大澂帶著在陝甘收集到的一些金石器物去拜訪他的老師、著名金石收藏家吳雲（1811—1883），在收到吳大澂的禮物後，吳雲寫了一封信給吳大澂：

> 恒軒賢阮足下，頃奉手翰並承惠關中古器各種，羅列幾案，土香四溢，欣謝無已。惟所贈過多，恐好古者見之未免妬眼欲紅。謹留《鄘鼎》一（無款識，以鄘縣出土即名「鄘鼎」）、瓦臺二、漢磚瓶一，餘四種繳上，以

[53]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劄》，上冊，頁381。
[54]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劄》，上冊，頁4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備轉贈他友。今日知耦園在尊齋賞古，滿擬趨詣，因風大且咳嗆頗甚，故不敢出門。附去《散盤》真本一幅，乞哂納。此拓有日減無日增矣。㊺

《散氏盤》乃清代中期出土的西周重器，後入內府，民間流傳拓本不多，所以吳雲才會說「此拓有日減無日增矣」。

次年春，吳大澂銷假回到北京翰林院任職，將《散氏盤》拓片帶到北京。潘祖蔭得知吳大澂有《散氏盤》拓片後，向吳借觀。吳大澂在致潘祖蔭的信中說：「拓本三冊謹繳，祈謐入。《散盤》拓本附呈鈞覽。大澂在南中曾見六本（退樓、艮菴二本，李筮魚、李眉生、趙次侯），此本以精拓漢碑與退樓丈易得之。舊拓舊題至精者以筮魚一本為最。」㊻

潘祖蔭收藏雖富，但手中卻沒有《散氏盤》拓片，所以請吳大澂打聽在蘇州的散氏盤拓本。吳大澂信中提到的退樓即吳雲；筮魚即李嘉福（1829—1894），浙江石門（今崇德）人，寓蘇州，也是晚清重要的收藏家。由李嘉福收藏的，且被吳大澂認為是最好的《散氏盤》拓本，今尚存世，上面有眾多題跋，包括吳大澂的篆書題跋。（彩圖2）

吳大澂在致潘祖蔭的另一通信劄中，向潘建議通過吳雲設法從李嘉福手中購得《散氏盤》銘文拓本：

> 筮魚藏《散盤》《智鼎》二幅，大澂為題之。今春詢及，尚不忍割愛。然筮魚奇窮，已典質殆盡，遲早必出，出則必歸退樓。若向索之，必據為奇貨，而又不肯脫手。此筮魚之皮氣，所以不能與之交易。可托退樓丈，無意求之，或可得也。㊼

李嘉福這時在經濟上十分拮据，經常將藏品變賣給吳雲。由於吳雲已經有《散氏盤》拓本，所以吳大澂建議潘祖蔭謀之吳雲：

㊺ 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第1輯，「吳大澂檔」，頁237-238。

㊻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吳大澂致潘祖蔭信劄（稿本），第48通。信劄並未裝裱成冊，這裡的編號是根據目前信劄的先後來編排，並不見得反映書劄書寫的時間先後。

㊼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吳大澂致潘祖蔭信劄，第21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中《散盤》一紙直三十金，退樓可托之，如笙魚肯脫手則大妙。㊽

笙魚近年無人理之。大澂二十年舊交，歸里後屢與往還，其情甚可憐。《盤》《鼎》二拓如肯割去，當屬寄來，五十金可得，尚不貴也。㊾

不過，當潘祖蔭正設法購買《散氏盤》拓本時，還有一位來自蘇州的文人也在打聽《散氏盤》拓本，他就是吳大澂的表弟汪鳴鑾（1839—1907）。汪鳴鑾，錢塘人，寓居吳門，其母為吳大澂母親的胞妹，自幼和吳大澂一起受收藏金石的外公韓崇（1783—1860）的影響，喜愛金石文字之學。汪鳴鑾也向吳雲打聽《散氏盤》拓本，吳雲回信寫道：「所需《散盤》拓本，弟在邗上覓得三種。一孫淵如臧者，自留；一為秋穀要去；一贈恒軒。去年鄭盦書來，謂在恒軒處見有贈本，屬向笙魚購求。笙魚初索五十金，後聞都中來訪，則不但高其價目，且效石呆子之寶折疊扇，雖重值亦不售矣。」㊿ 從吳雲此信可知，潘祖蔭（鄭盦）果然聽從吳大澂的建議，請吳雲代向李嘉福求購。但是，當李嘉福得知京師也有人有意於此後，卻變卦不肯出讓了。

吳大澂在致潘祖蔭的信中提到《散盤》、《曶鼎》拓片，都是青銅器的拓片。青銅器的收藏雖然在宋代就已成為金石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青銅器的拓片製作也已開始，但是在不是平面的青銅器上拓銘文，比起在平面的石刻和木板上拓碑帖，要困難得多。青銅器拓片的收藏，也是在清代中期以後才在文人中漸成風氣，早期的青銅器拓片極少。晚清時期陳介祺和吳大澂等製作的青銅器拓片雖然精美，但畢竟不是舊拓。因此，青銅器拓片的價格和碑帖價格的比較，就成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顧文彬光緒六年（1880）三月十一日日

㊽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吳大澂致潘祖蔭信劄，第46通。

㊾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吳大澂致潘祖蔭信劄，第47通。

㊿ 吳雲，《兩罍軒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光緒甲申刊本），卷11，頁15a，新頁碼883。信中提到恒軒即吳大澂。吳雲在信中提到，他贈送給吳大澂一本《散氏盤》拓本。但在上引吳大澂致潘祖蔭的信劄中，吳大澂聲稱其所藏《散氏盤》拓本是用一本漢碑精拓和吳雲換來的。為何兩者說辭不一，原因不詳。或是在吳雲贈他《散氏盤》拓本後，他回贈漢碑精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記記載，「有盛寅谷與程小廬顧訪，持示石谷山水軸（有朱竹垞、王麓臺兩題）、惲南田荷花軸，索價二百元，余還八十元，相懸殊甚，只得任其攜去，然頗惜之。尚有周《師趛鼎》拓本一軸，有銘約三十字，索價千元，余囑其攜示，再行議價。」[61] 這一記載頗引人注目：有朱彝尊（1629—1709）和王原祁（1642—1715）這兩位名家題跋的王翬（1632—1717）的山水軸，外加惲壽平（1633—1690）的荷花軸，開價二百元，而一個周《師趛鼎》的拓本，銘文僅三十餘字，僅《散氏盤》銘文的十分之一，居然開價一千元，實在令人吃驚。顧文彬沒有說明這一拓片是否是全形拓，如果是全形拓的話，必須有許多名家的題跋方能出此高價。雖然我們不瞭解這一拓片最後在市場上的價格如何（顧文彬日記沒再提起這一拓片），但是，能開價如此，也說明，有些青銅器拓片也有很高的市場價值。

當藏家缺錢時，還常會將自己收藏的拓片質押於他人處，而非直接售出。汪鳴鑾在致吳大根（1833—1899）的信中說：「潘師碑拓三件，皆系同治初質於均初，今均願加倍備價贖歸，茲開一單奉上，即祈交沈處一查，如三件均在固為極妙，即不然，或有一二件亦好。」[62] 汪鳴鑾所說的「潘師」亦即潘祖蔭，「均初」即沈樹鏞。大約在1863年，潘祖蔭將碑帖三件押於沈樹鏞，數年後想加倍贖回。

在拓本的流通中，和有價轉讓一樣通行的便是交換。或是用其他藏品交換拓片，或是用自己金石拓片換他人的拓片。沈樹鏞在同治丁卯（1867）冬月跋《漢兗州刺史雒陽令王稚子雙闕》云：「劉燕庭方伯舊藏，即小蓬萊閣故物，近為黔南景劍泉宮詹所得，海內瑰寶也。余於今年十月重來都門，篋中攜有米海嶽《三箚卷》，宮詹必欲得之。特以《雙闕》來易。時宮詹銳意搜羅宋元名跡，而余正酷嗜古碑，互易寶藏，皆大歡喜。」[63] 沈樹鏞提到的米芾《三箚卷》，亦稱《三帖卷》，今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卷上鈐有項元汴、安岐等明清大藏家的收藏印及「乾隆御覽之寶」和「石渠寶笈」等清內府的收藏印，

[61] 顧文彬著，蘇州市檔案局、蘇州市過雲樓文化研究會編，《過雲樓日記》，頁507。
[62] 汪鳴鑾致吳大根信箚（吳湖帆舊藏稿本）。
[63] 沈樹鏞，《漢石經室金石跋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書法史上的一件流傳有緒的名跡。它應是在咸豐十年（1860）九月，英法聯軍侵入北京、圓明園被搶掠焚毀後，流入市場被沈樹鏞購得。景其濬能以黃易（小蓬萊閣）和劉喜海（燕庭）遞藏的《漢兗州刺史雒陽令王稚子雙闕》拓片與之交換，足以說明經名家收藏的稀有拓本的珍貴性及其市場價值。

沈樹鏞所藏《姜行本紀功碑》拓本，也是交換而來。他在題跋中寫道：「徐星伯先生《西域水道紀》云，碑在巴爾庫勒南山之巔關壯繆祠東三十餘步。土人相戒，不得拓之，即致風雪斷行人，故拓本甚不易得。去年在都門得是碑整幅，甚喜。今歲夏六月來吳門，于顧君子常處獲見是冊，用墨濃厚，神彩尤足，因以北魏石刻易得之。同治丙寅冬十月鄭齋記。」[64] 按照題跋所云，沈樹鏞於1865年，曾在京師收得一件《姜行本紀功碑》拓本，返蘇後，見到一本更精彩的，便以北魏刻石拓本易得。

1877年吳大澂在北京時，也曾想以自己所藏拓片與潘祖蔭換《沙南侯獲碑》拓片，他在致潘祖蔭的信中寫道：「吾師所藏沙南石刻有三本，如蒙檢賜一本，當以潘宗伯題名及硃拓《石門頌》（皆止一本，無副本）二種仰報厚意，想必鑒其忱，不終秘之也。」[65]《沙南侯獲碑》在道光年間才在甘肅鎮西廳煥采溝（今屬新疆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發現，路途遙遠，拓本很少。吳大澂在寫此信之前，於1873—1876年任陝甘學政，曾求陝甘總督左宗棠（1812—1885）等在甘肅的官員為其尋找《沙南侯獲碑》拓本，左宗棠也確實為他找到了幾本。[66] 大概吳大澂在甘肅得到的拓本不佳，所以他想以硃拓《石門頌》交換潘祖蔭所藏《沙南侯獲碑》拓本。

四、索拓資

1870年代初，當京師的官員在潘祖蔭的帶動下形成了研究金石學的風氣時，收藏家們紛紛把目光投向了山東濰縣，因為那裡住著晚清最大的金石收藏

[64] 沈樹鏞，《漢石經室金石跋尾》。

[65]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吳大澂致潘祖蔭書箚，第25通。

[66] 參見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頁34-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陳介祺（1813—1884）。陳介祺早年曾在京師任官，但很早就隱退。離開北京後，陳介祺不再能像翁同龢那樣在京師購買金石碑帖，但卻能在家鄉潛心蒐藏新出土的文物。山東為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出土文物豐沛。陳介祺也和陝西的文物商保持著密切的聯繫，[67] 經過多年搜羅，他在1870年代成為晚清金石收藏第一人。其實，早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前，陳介祺就已在收藏界頗為活躍，他和吳大澂的外祖父韓崇、老師吳雲都是老友。太平天國覆亡後，捻軍的威脅被消除，西北回亂被平定，各地的金石收藏風氣逐步恢復，陳介祺既富且精的收藏、目光如炬的鑒定、製作精美的拓片，很快讓他重回晚清收藏圈的中心，備受關注。

由於山東濰縣並不靠近政治中心和商業中心，晚清的收藏家大多無緣到陳介祺的家中親自觀賞他的收藏，所以只能通過通信和互贈拓片來交流。[68] 吳大澂在1877年八月十日致潘祖蔭的信箚中提議：「函丈臧古至富，每器拓十分留之，可與簠齋隨時交易，非精拓不足以動之耳。」[69]

但是，像潘祖蔭那樣可以和陳介祺匹敵的收藏家實在太少，因此，也很少有人能夠通過交換來得到陳介祺比較完整的拓片。吳大澂在陝甘學政期間，雇拓工遍拓在陝石刻，陳介祺要求一種石刻拓多分，也只有這樣，吳大澂才能和陳介祺多交換些拓片。

為了解決索拓過多的問題，陳介祺在1873年七月致吳雲的信箚中提出了一個方案：「南中好金石文字者，近當益多。有好拓手如張叔未濃墨拓能為之者，其人又極文雅安詳，不至損失金石，不至荒唐，可以共事，諸家醵資來拓敝藏，或公與束脩路費，或以拓本計直（如此尤妥，多拓尤便），二人前來，一人作飯伺候，弟對門有一閑院，甚可住（伯瑜即在內住）。此系閑譚，倘竟有成，則請先為拓尊藏全分各十紙，精者二十紙。……此外大小各銅器、瓦

---

[67] 參見松丸道雄，〈陳介祺與蘇氏兄弟——關於陳氏的古董的搜集〉，收入孫慰祖等編著，《陳介祺學術思想及成就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頁340-354。

[68] 吳大澂曾有此計畫（見吉林省博物館藏吳大澂致王懿榮信箚），但最終還是未能實現。他和陳介祺通信多年，但最終還是緣慳一面。

[69]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吳大澂致潘祖蔭信箚，第58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六朝各種，均求無遺。」⑦⓪ 陳介祺建議蘇州的收藏家釀資派人到濰縣來拓他的藏品，如此議可行，請吳雲先將自己的全部收藏拓十套全份，並選其中的精者各拓二十紙（包括全形拓），作為交換條件。

但是，蘇州的收藏家們並沒有接受這一建議。由於各方索求過多，陳介祺對拓片的品質要求又極高，拓工在他的督導下，所制拓片極精也慢，所以，陳介祺便向那些不能與之交換拓片、又想要他的藏品拓片的人們收取「拓資」。他特地為此撰寫和刻印了《傳古小啟》（「傳古」即製作拓片），附上拓片樣本，列出收費標準，分寄給金石收藏的兩個中心——北京和蘇州的友人，如有人感興趣，便可按照訂好的收費標準付款，陳為其製作拓片。⑦①

由於在此之前，友人之間對於自己藏品的拓片，通常作為禮品贈送和交換，陳介祺向友人索取拓資，多少有些悖於常情。但陳介祺有自己的理由：索拓者太多，量太大（經常索要「全分」），支付拓工工資，購買好的紙張。這些都需要花費，所以收取適當的工本費，並非為了謀利，而是以拓養拓。他在致潘祖蔭的信（1875年）對此專門作了解釋：「傳古一束，匆匆未及粘本，且不便寄。其值八十金，交廉生處即可。若吾兄自留，則無須矣。前所寄上者，如未備，乞檢錄一目補寄。即欲多用一分，亦當寄也。（無須助資）傳古之事近鄙，然助我拓資，俾得一一早為拓傳，當不敢辭勞，以副同志之望。」⑦② 此時，潘祖蔭已是禮部侍郎，主持京師文壇風雅，又是陳介祺的世交，所以陳介祺說，如果潘祖蔭自留，無須付拓資。若是為他人代求或送人，則請「助我拓資」，這樣才能「早為拓傳」。

由於王懿榮住在北京，與京師官員收藏家多有交往，陳介祺便托這位山東老鄉為自己推銷拓片。1875年四月，陳介祺致函王懿榮：「春來拓藏石，僅得六朝者四十種，今寄上兩分八十紙，存之以待索者。每種銀一錢五分，尚有

⑦⓪ 陳介祺，《簠齋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影印本），頁1044-1045。

⑦① 陳介祺在1874年十月底致王懿榮的信中說：「拓費則約如《傳古啟》，八十金，共三百餘紙。」見陳介祺，《簠齋尺牘》，頁304。吳雲在致陳介祺的信中說：「八月中奉到七月廿九日手翰並周秦金石墨拓三十二紙，《傳古小啟》四本，一一領到。」見吳雲，《兩罍軒尺牘》，卷9，頁8b，新頁碼650。

⑦② 陳介祺，《簠齋尺牘》，頁38-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十種未拓出，後再補寄。系初學拓，故令用杭連紙，再用棉紙精拓，須二錢一種，如可銷法帖肆估尤便，有索者示知即寄。拓精則不能迫促之，然一紙可敵數十百紙，是以不能如碑估之貪多，務得之求傳古而已。」[73] 陳介祺寄給王懿榮的拓片，是為了「存之以待索者」，但王懿榮如果能夠交給琉璃廠的古董商買去出售則更為方便，因為讓王懿榮在朋友圈一一詢問，畢竟比較麻煩。不過，陳介祺特地指出，若有法帖肆估願意經營他的拓片，他也不會逐利貪多，而是堅持精拓。

1878年九月三日，王懿榮致信繆荃孫，告知要得到陳介祺的拓片，需要付拓資：「陳壽卿丈各種搨本，詳其所刻《傳古小啟》中，亦在京師，未及攜來。此老雅好今錢，俱有搨資，詳見《小啟》。然其拓墨之精，古今所無，工本亦不支也。」[74] 王懿榮對陳介祺的評價是雖「雅好今錢」，收取拓資，但「拓墨之精，古今所無」，而且所收費用「工本亦不支也」，實在不算過分。[75]

陳介祺在1883年四月十五日致王懿榮的信中，提到繆荃孫想得到他的秦代刻石拓片。信後附了一張拓片清單：「秦石拓二紙，漢魏六朝石拓一百五十紙（唐宋金數紙，玉造像拓一紙，非白石）又附銅鉛造像拓三十二紙，拓費十四兩。」[76] 這批拓片似為王懿榮代繆荃孫索求，因為有王懿榮致繆荃孫一箚云：「陳壽卿前輩寄來石搨全分，並銅鉛各種造象拓本，共為一包，收去搨值十四金。前所交下之卅金，尚餘十六金，茲並銀券一紙，合併納上，伏祈查入。」[77] 從信的內容來看，王懿榮如實地向繆荃孫收取了陳介祺的拓資十四兩白銀，並未附加任何費用。而繆荃孫也早已將一筆錢寄存在王懿榮處，請王代其蒐集拓片。

---

[73] 陳介祺，《簠齋尺牘》，頁438-439。

[74] 王懿榮，《王懿榮集》（濟南：齊魯書社，1999），頁152-153。

[75] 陳介祺不但托王懿榮銷售他的拓片，而且還請吳大澂為他銷售拓片，雅好今錢，於此可見一斑。參見陳介祺，《簠齋尺牘》，頁473。

[76] 陳介祺，《簠齋尺牘》，頁576。

[77] 王懿榮，《王懿榮集》，頁1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集資訪拓

晚清收藏家的收藏雖很豐富，各處仍有不少未拓和拓片流傳不多的碑刻。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晚清的文人和專做碑帖生意的碑估根據地域之便，訪碑拓碑。在北京、山東、陝西、江蘇、浙江、四川、廣東等地都有拓碑活動，無意中形成了分佈各地的網路。正如柯昌泗所云：「當光、宣之際，訪碑盛極一時。」[78]

1873年，吳大澂出任陝甘學政，吳大澂的朋友們得知這一消息後都極為興奮，紛紛寫信請吳大澂訪拓陝西碑刻。吳大澂抵陝後，馬上雇石門拓工張茂功各處拓碑。不過，吳大澂所得拓片，多與友人交換。只是偶爾涉及拓資。1875年九月十九日，吳大澂在致陳介祺的信中寫道：「石門拓工張茂功到省，拓到漢魏各刻，似較去年所拓有精到處。適有僕人入都，忽忽檢寄四分（每分六種），乞為代售。又奉贈石門頌額十紙，祈察入。」[79] 吳大澂所寄，既有贈與陳介祺的《石門頌》額，也有請陳代售的拓片。

還是「雅好今錢」的陳介祺最具經濟頭腦。他在1873年十二月立春後一日致鮑康（1810—1881）的信中說：「拓《琅邪臺》秦刻，約四錢一紙，捌錢一分。即可醵資，有卅餘分，二三月即可遣工前往，拓畢再拓晉石。晉石距此八百餘里，來往路費過多，每分捌錢亦可，非卅餘分則不能往矣。如拓《李夫人石》則共四十餘分亦可，《李》可四錢一紙也。」[80] 陳介祺在遣工拓碑時，對所需費用總數已經做了大致的估算，每份單價多少，需要多少份，都有計劃，只有當收藏家認購達到一定數額後，他才遣工往拓。

此後，陳介祺果然遣人往拓《琅邪臺》秦刻。次年六月六日，陳介祺致信

---

[78] 葉昌熾、柯昌泗，《語石、語石異同評》，頁91。在廣東拓碑的例子如朱一新（1846—1894）。朱於1888年到廣東肇慶任端溪書院主講，當地的七星岩為一名勝，石刻甚多。他在致繆荃孫的信箚中說：「星岩中，唐宋以來題名極夥，字俱完好。際此水落之時，既便訪求，亦宜椎拓，君其有意乎？」見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箚》，上冊，頁87。

[79] 吳大澂致陳介祺信箚（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稿本）。

[80] 陳介祺，《簠齋尺牘》，頁798-7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鮑康云：「《琅邪臺》新拓秦刻精本，每紙一金，有索者乞示及。（已托廉生十紙）」[81] 這時，拓資已經從原來估算的「約四錢一紙」變成了實際價格「每紙一金」。同年八月九日，人在陝西的吳大澂在致陳介祺的信中感謝陳「代拓十分」琅邪臺秦刻，並支付了拓價。[82]

陳介祺收費比原來估算的高，可能是實際花費比他設想的要多。在晚清人的拓碑記錄中，經常會提到物質條件對拓碑造成的困難。有的時候，「拓工以碑過巨，憚梯架之費，因而置之」。[83] 葉昌熾曾談到雲峰山石刻拓本價格變化和椎拓物質條件的變化之間的關係：「雲峰山《鄭文公碑》，初架木時，吳退樓觀察得一本，至費五十金。後來者因臺舊貫，役省功倍，其值遞減至二十之一。好古者家置一編矣。」[84] 葉昌熾的這段記載告訴我們，某些摩崖刻石初拓本的昂貴不但因為時間早，更在於初拓時要搭腳手架，費用就昂貴。如果腳手架在初拓後並未拆除，後來者再來椎拓，費用會省去許多。由於成本大幅降低，使得更多的人擁有雲峰山刻石的拓片。

由於有利可圖，專營碑帖的「碑估」在這一時期的訪碑拓碑中也非常活躍。在京師一帶，與文人們合作的碑估是李雲從，他的名字多次出現在文人的信劄和筆記中。[85] 葉昌熾致繆荃孫劄云：「昨李雲從自山右歸，半年之久僅到

---

[81] 陳介祺，《簠齋尺牘》，頁840。

[82] 謝國楨編，《吳愙齋（大澂）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頁20。

[83] 葉昌熾、柯昌泗，《語石、語石異同評》，頁57。

[84] 葉昌熾、柯昌泗，《語石、語石異同評》，頁78。

[85] 李雲從「直隸故城人，幼習碑賈，長益肆力於考據。……雲從為潘文勤所賞識，有所售，輒如數以償。」（參見孫殿起，《琉璃廠小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頁27。）李雲從在京師一帶收藏家中的口碑甚佳。作為碑估，除了拓碑外，也做舊碑帖買賣。繆荃孫的日記中，記李雲從送看碑帖甚多，如「李雲從送三監本《皇甫碑》來。」「李雲從送元家廟碑，議價六十金。」（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1）》〔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頁128、155。）費念慈致繆荃孫信劄中也提到請繆荃孫代購元拓《家廟碑》一事：「拓碑人李雲從處有舊拓《顏家廟碑》，索六十金，弟思收之，是元拓本也，聞之廉生所云。弟與李君不熟，乞兄代呼其來（以速為妙）。屬即送弟處一閱，至感。能為代購並講價尤幸，然總須一寓目也。」（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劄》，上冊，頁359-3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壽陽、平定、澤州三處，所拓約八十種，雖無精品，皆前人所未著錄。深山古剎，搜訪不易，頃與平心商榷定價，大小通算，每種銀二錢。……據云晉省古刻，此次所得僅十之一，此後輕車熟路，若得旅資百數十金，留晉一年，週曆全省，當可囊括包舉。」⑧⑥

李雲從甚至曾不辭勞苦，跋涉數千里去拓碑。「《高句驪好太王碑》，在奉天懷仁縣東三百九十里通溝口。高三丈餘，其文四面環刻，略如《平百濟碑》。光緒六年，邊民斬山刊木，始得之。窮邊無紙墨，土人以徑尺皮紙，搗煤汁拓之。苔蘚封蝕，其坳垤之處，拓者又以意描畫，往往失真。……其後碑估李雲從裹糧挾紙墨，跋涉數千里，再往返，始得精拓本」。⑧⑦

在南方，拓碑活動同樣活躍。1896年繆荃孫出任江甯書院講席，友人們都期望這位從年輕時就四處訪碑拓碑的大學者⑧⑧ 在江蘇拓碑，分寄拓片。葉昌熾在1896年十一月初九日致繆荃孫信劄云：「蔚若前輩（筆者按：即吳郁生，1854—1940）管理省館，欲拓蘇省碑版。江甯一府，渠曾托張頌穆學博。頌翁非所好，且聞調署通州，幸公在寧，此願可償，擬懇飭拓工遍拓全府石刻，除梁碑不拓外，每種各拓三分（棲霞只須兩分）。如能推廣他郡更妙。」⑧⑨

在江蘇，繆荃孫雇傭的拓工即碑估聶明山。除了江蘇，繆荃孫組織的拓碑活動也延伸至鄰近的省份。葉昌熾《語石》云：「近江寧帖估聶某攜氈蠟遍游皖南諸山，復訪得潛山石牛洞題名六十通，貴池齊雲山題名六十通，桐城浮山題名二十餘通，皆前人所未見。」⑨⓪ 聶明山赴皖拓碑，應該也是繆荃孫籌畫的，因為葉昌熾在1896年十一月初九日致繆荃孫的信中說：「承示皖江古刻，宜留一分，甚善甚善，敬祈為侍留一全分，所需數十金，阮囊尚可措置，明歲當陸續寄繳。」⑨①

作為晚清最重要的金石學學者之一，繆荃孫所到之處，都會和當地的「打

⑧⑥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劄》上冊，頁414。
⑧⑦ 葉昌熾、柯昌泗，《語石、語石異同評》，頁134-135。
⑧⑧ 關於繆荃孫一生的訪碑拓碑活動，可參見楊洪升，《繆荃孫研究》，頁394-399。
⑧⑨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劄》，上冊，頁406。
⑨⓪ 葉昌熾、柯昌泗，《語石、語石異同評》，頁115。
⑨①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劄》，上冊，頁405-4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碑人」聯絡，雇他們拓碑。在北京，他請李雲從；在故鄉常州，他雇沙士瓚、趙阿二，巢勗生；在山東，他雇張天翔、黃士林在長清、青州、泰山、肥城等地拓碑；在河北，他雇田福往真定拓碑，趙姓打碑人在唐山拓碑。[92] 金石學學者和拓工之間的密切合作關係，由此可見一斑。[93]

從以上幾則引文不難看出，晚清文人拓碑的規模極大，動輒一個縣、一個府、甚至一個省的訪拓，大有竭澤而漁之勢。而支撐著這些覆蓋面極大的拓碑網路的是兩個因素：一是對拓片巨大需求；二是陳介祺等實行的「醵資」模式。後者降低了拓本的成本，使遠距離和大面積的拓碑活動成為可能，也使得更多的學者可以同時分享拓碑的成果。

六、拓片和晚清的藝術與學術

以上對晚清拓本的流通方式的描述堪稱簡略，因為在晚清人的日記、信劄、題跋、筆記、詩文、金石著錄中，關於拓片的製作、贈與、交換、買賣、品評的記載極多，它們是晚清金石學繁盛最直接的證據。

以上描述的流通方式，並不為晚清所獨有。在金石學興起的宋代，拓片市場就已經存在，友朋之間贈送和交換拓片也是常事。在清初，就有文人出資派遣拓工去異地訪碑拓碑。[94] 但是，在晚清，原來已經存在或萌芽的拓本流通方式都更為廣泛地運行。對晚清現象的描述至少可以告訴我們，相較於前代，拓片的流通何以在晚清以更大的規模進行。

以規模而論，晚清文人發現了許多前代未曾椎拓的金石原刻。湖州籍學者陸心源（1834—1894）致繆荃孫信劄云：「弟近拓得吾湖黃龍洞、新市等處磨厓

[92]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1）》，頁101、105、106、161、164、171、175、228、233。

[93] 參見白謙慎《吳大澂和他的拓工》中的相關討論。

[94] 在清初金石收藏家曹溶（1613—1685）的詩集中，有〈資耀寰入秦托其搨寄碑本〉和〈遣胥至曲陽搨北岳廟碑〉等詩。見曹溶，《靜惕堂詩集》（雍正年間刊本），卷6，頁7b-8a。薛龍春在《鄭簠研究》一書中，也有清初訪碑區域以及文人之間贈送、交換、購置拓片的討論。見該書頁50-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碑刻多種，頗有前人所未見者，一俟春融，再當寄奉。」[95] 這只是隨手拈來的例子，類似「前人所未見者」這樣的語言，在晚清人的文字中，俯拾皆是。而本文還未涉及一些新的拓片品種，如陶文和封泥的拓片，這些都是在道光以後才被發現和收藏的新品種（圖1）。而在乾嘉時期，金石拓片收藏中「金」的比例很小，人們收藏的主要是「石」的拓片。以製作工藝而論，青銅器的銘文常在器內不平的壁面或底部，椎拓難度要大許多。道光以後，青銅器拓片的製作方法有了長足的進步，促進了青銅器拓片的流通和青銅器銘文的研究。

晚清一些著名金石收藏家的藏拓數量驚人。以繆荃孫為例，所藏拓片多達一萬三千餘種。吳大澂的門人王同愈（1856—1941）在列舉了晚清著名的金石書畫收藏家之後，提到他的老友葉昌熾（鞠常、鞠裳）的拓片收藏：「鞠常同年拓本多至四五千種，方之各家，猶在附庸之列。顧鞠常收錄經幢至五六百種，詳人所略，並世無其匹，亦足以南面百城矣。」[96] 王同愈寫此段文字時，葉昌熾所藏拓本已經多達四五千種，[97] 但仍只能附當代大藏家之驥尾，不過，葉昌熾的經幢拓片收藏別具一格，獨步其時。這些都反映了拓片收藏的規模化和專門化。

上文提及的官員或學者都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學家。人們或許會問，除了這些高官和著名學者，在晚清還有多少人收藏拓片？要回答這個問題很困難，因為從文獻流傳的角度來看，那些處於文化中心的人們的文字最容易留存下來，傳世文獻本身已經帶有不平衡的特點。但正如上文所顯示的那樣，拓片的價格差異極大，便宜者才幾錢一紙，這個價格本身允許多個社會階層有比較廣泛的參與，至少低層級的官吏和普通文人可以小規模地收藏拓片。繆荃孫在憶及自己在京師收藏拓片的經歷時曾說：「丙子成翰林，供職京師。廠肆所謂帖片者，不甚貴重，當十錢數百即可購得一紙，而舊拓往往雜出其中。」[98] 這段自述既說明了其時普通拓片價格低廉，也說明了對於那些有鑒定眼光的人來說，

---

[95]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劄》，下冊，頁606。

[96] 王同愈著、顧廷龍編，《王同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473。

[97] 葉昌熾本人在《語石》的1901年的序中說自己「訪求逾二十年，藏碑至八千餘通」。見葉昌熾、柯昌泗，《語石、語石異同評》，頁1。

[98] 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序》，收入新文豐出版社編，《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第1輯，第26冊，頁195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即使沒有雄厚的財力，撿漏的機會也依然很多。況且，低層級的官吏也可以利用地域之便拓碑，並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拓片與人交換。

李文傑關於晚清總理衙門章京楊宜治（約1845—1898）的日記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低級官吏中收藏拓片的例子。楊宜治在北京生活期間，尚能從自己微博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錢來購買拓片。李文傑在文中列有「《懲齋日記》所載總理衙門章京的業餘生活」一表，將楊的光緒十三年至十五年692天的日記中所記的業餘活動分為「招飲」「壽禮、賀婚娶、升遷」「喪事活動」「觀碑帖、臨書法」四類，而「觀碑帖、臨書法」有60次，頻繁度僅次於「招飲」，在各項活動中列為第二。[99] 李文傑進一步觀察到：「日記中多有同事互相拜訪的紀錄，也多有同事聚會的記載，但在這些過程中，他們更關心的，是誰又購進了難得的版本，誰又得到了精美的碑帖，誰得升遷，誰家婚娶。無論從時間、精力的分配還是從興趣而言，總署和刑部的公務似都不能算楊宜治的『業務』。他在公務之外投入的興趣、耗費的時間和精力遠超過他本職事務，倒是他的本職事務反成了『業餘』。」[100] 也就是說，「得到了精美的碑帖」也是當時一些低級官吏的日常生活中的一項重要的文化活動。如果這個例子具有典型性的話，那麼，我們大概可以說，拓片的收藏同時滲透到了上、下層文人生活的肌理之中，儘管程度可能有所不同。

前文在討論晚清市場的拓本價格時，得到以下結論：宋拓《閣帖》價格最高；著名漢碑如《華山碑》的宋拓次之；唐代著名書家書寫的名碑拓本再次之；其他的拓片等而下之。這一價格等級既和古董的觀念有關，也和書法的經典有關。說它和古董的觀念有關，就是因為上述的宋元舊拓，數量只會日漸稀少。

說它和書法有關，是因為《閣帖》是「二王」書法最重要的刻帖、《華山碑》是漢隸名品（甚至被認為是漢隸第一）、《集王聖教序》是王羲之行書最重要的碑刻，《皇甫誕碑》和《九成宮醴泉銘》都是唐代楷書的經典。市場價格從另一個角度體現了書法藝術在中國文人（包括晚清文人）日常生活中

[99] 李文傑，〈總理衙門章京的日常生活與仕宦生涯—《懲齋日記》與楊宜治其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2010），頁65-66。

[100] 李文傑，〈總理衙門章京的日常生活與仕宦生涯—《懲齋日記》與楊宜治其人〉，頁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重要性。今天的藝術史學者常引用晚明著名的收藏家和鑒賞家李日華論列藝術品次第的一段文字：「門人黃章甫索書，余因戲為評古次第云：晉唐墨蹟第一；五代唐前宋圖畫第二；隋唐宋古帖第三；蘇黃蔡米手跡第四；元人畫第五……」[101] 李日華的觀點與晚清的拓片次第庶幾相似。

由於中國書法不是再現性的藝術，它的藝術語言的掌握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古代經典的學習。我們在晚清文人的日記和筆記中，能見到很多欣賞和臨摹拓本的記載。翁同龢跋自藏《韓仁銘》云：「丙申春，得見王廉生祭酒藏本，墨光如漆，筆勢若蛟鼉蹲舞，此本頓形鈍滯矣。龢記。」[102] 也就是說，翁同龢在見到了王懿榮藏的拓本後，深感自己所藏的本子不及王懿榮的精彩。數年後，翁同龢的侄子翁斌孫（1860—1922）又得一本，翁同龢再次在自己所藏的那本上題跋：「光緒辛丑正月，斌孫得一本，王任堂、楊龍石皆有題記。首行熹下四點尚具，雖未逮王祭酒藏本，然神氣飛動，與《泰山都尉孔君碑》仿佛，較此本蓋遠勝之。」[103]

前引潘祖蔭致友人信箚，1870—1880年代，沈秉成在南方以巨值購入項元汴和陳繼儒舊藏的兩套《閣帖》。1884年，沈秉成入京為官，將自己收藏的《閣帖》帶到北京。翁同龢光緒十三年（1887）六月廿八日日記記載：「歸後訪仲復，遇諸塗，借伊所藏項氏《閣帖》十卷，伊不肯付僕人，親送來也。暢談而去，並約我看碑。《閣帖》十卷完好，宋拓本也（古厚如宋舊出，鍾書皆如篆籀，於此可悟古法）。有王穉登跋。康熙中藏鄭氏，後入張虎未家，虎未題簽，楊又雲收得之，不知何由到吳門，仲復在蘇購得，真希世珍矣。（第九卷大令《諸舍帖》，較別本字較密，末行只有三字。）」[104] 翁同龢認為，有好的《閣帖》本子，「於此可悟筆法」，因此在家欣賞沈秉成的《閣帖》三日後，方將其歸還。[105]

[101]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明末刻康熙李瑁重修本），卷4，頁1a。
[102] 王敏輯注，《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150。
[103] 王敏輯注，《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頁150。
[104]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5卷，頁2168-2169。
[105] 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5卷，頁21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臨摹拓本也是常態。莫友芝咸豐十一年（1861）四月十二日日記「遍檢理篋中碑帖，擬以兩《石鼓》《嵩山三闕》各粘為大冊，以便臨仿」。[106] 莫友芝是晚清書壇的篆隸名家（特別是篆書），上引日記提到的石刻，《石鼓文》是篆書；《嵩山三闕》中，兩個為篆書，一個為隸書。在印刷術還沒有普及的時代，這些書法的領軍人物們，直接向自己收藏的稀有拓本學習。

前文談及，晚清《散氏盤》的拓片非常少，吳雲贈給吳大澂一本。對於這本難得的拓本，吳大澂不但十分珍視，而且經常臨摹。[107] 大概在1878年左右，潘祖蔭致信吳大澂請教大篆書法：「吾弟從前作篆從何入手？若始作篆而即從鐘鼎臨摹，似難措手也。《散盤》曾臨百本，能臨一本見惠乎？」[108] 不久，吳大澂將自己所臨《散氏盤》送給潘祖蔭，潘祖蔭在致吳大澂信箚中說：「惠臨《散盤》，感謝，感謝。」[109]《散氏盤》銘文長達三百餘字，即使以三日臨一通的話，臨百通也要歷時一年左右，可見吳大澂此時根據拓本來臨習大篆，下了很多功夫。此後，吳大澂一直沒有中斷臨習《散氏盤》。[110] 蘇州圖書館藏有吳大澂在光緒丁亥除夕（西曆1888年初）所臨《散盤》一通。（圖2）

討論晚清的拓片流通也不可避免地引向了另一個書法史的問題，亦即：碑學的興盛和拓片的關係。關於晚清的碑學書法，康有為（1858—1927）有一段經常為人引用的著名論述：

> 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後，小學最盛，談者莫不藉金石以為考經證史之資。專門搜輯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

---

[106] 莫友芝著、張劍整理，《莫友芝日記》，頁27。

[107] 吳大澂還曾用石印法複製《散氏盤》精拓。王懿榮曾在一個石印本上這樣跋道：「吳清卿中丞取《散氏盤》精拓本，以洋照石印法出之，幾可亂真。此較雙鉤覆刻者為勝，去真跡不至雲下一等也。」王懿榮題石印本《散氏盤》拓本見《中國嘉德2005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圖錄（2005年5月15日，北京），編號1701。

[108]《潘文勤公與吳愙齋信箚》（蘇州博物館藏顧廷龍抄本），頁63a。

[109]《潘文勤公與吳愙齋信箚》，頁64a。潘祖蔭的信箚無紀年，時間應在1877年吳雲在蘇州贈予吳大澂《散氏盤》拓本、吳回到北京任翰林院編修後。

[110] 如他在1886年五月在吉林時，曾臨一通。在近年的拍賣市場上，不時能見到吳大澂所臨《散氏盤》銘文，可知他一直用心《散氏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碑既多，考證亦盛，於是碑學蔚為大國。適乘帖微，入纘大統，亦其宜也。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大啟秘藏，著為《安吳書論》，表新碑，宣筆法，於是此學如日中天。迄於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⑪

康有為論書喜作驚人之語，其書論多有誇張不實之詞，已有不少學者指出其訛誤。譬如，康氏所謂「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的觀點，近年來就遭到不少學者的批評。在晚清，帖學書法依然有著十分旺盛的生命力，⑫ 而像何紹基、翁同龢這些晚清成就最高的書法家，其實都是碑帖兼蓄。

但是，我們又應該看到，康有為的碑學理論確實是在拓片收藏非常普遍的文化環境中產生的。《廣藝舟雙楫》的主要工作正是在各種拓片流通最多、收藏風氣最盛的京師完成的。康有為《年譜》自述：「沈子培勸勿言國事，宜以金石陶遣。時徙居館之汗漫舫，老樹蔽天，日以讀碑為事，盡觀京師藏家之金石凡數千種。自光緒十三年以前者，略盡睹矣。擬著一金石書，以人多為之，乃續包慎伯為《廣藝舟雙楫》焉。」⑬ 如果沒有在北京得以流覽數以千計的大量碑拓，康有為要在短時間內完成這一碑學史上影響最大的書學著作似乎是不可能的。

金石拓本的流通對晚清篆刻的影響也顯而易見。治中國篆刻史的學者都知道，與古物收藏的範圍不斷擴大同步的是，晚清篆刻的取法對象也日益廣泛。以當時和金石收藏家交往最多的四位篆刻大家王石經（1833—1918）、趙之謙（1829—1884）、吳昌碩（1844—1927）、黃士陵（1848—1908）為例，來簡略討論拓片和篆刻藝術的關係。王石經是濰縣人，和陳介祺的交往甚密，他曾為陳介祺、潘祖蔭、吳雲等多位金石家刻印，有時直接以鐘鼎文入印。趙之謙

⑪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收入《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下冊，頁755-756。

⑫ 參見曹建，《晚清帖學研究》（天津：天津美術出版社，2005）。

⑬ 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十四年（1888）十月條。見樓宇烈整理，《康有為學術著作選・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曾居京師十年，和潘祖蔭、沈樹鏞等關係密切。他的印章取法更為廣泛，秦漢權量、詔版、錢幣、鏡銘、磚瓦等金石文字都能入印，並融會貫通，遊刃有餘。⑭ 曾經作為吳大澂幕僚的吳昌碩和黃士陵也同樣把金石文字作為形成自己藝術風格的路徑。吳昌碩取法封泥，黃士陵取法金文，別開生面。（圖3）雖然他們都能接觸到金石原物，但是金石銘文卻主要以拓片的方式呈現的。

晚清金石學和其他學術之間的密切關係，學界所論眾矣。此處僅以晚清的青銅器及其銘文研究來做一討論。清代的青銅器收藏及研究在阮元（1764—1849）的時代初具規模。阮元編撰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是清代吉金研究的開風氣之作。雖然阮元在晚清學者中的聲望很高，但是，他的這部著作卻並不為晚清學者所推崇。上海圖書館藏有吳大澂舊藏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大澂在他的批註中多次指出阮元所收錄書中的偽器。而判斷偽器的重要依據，就是銘文的書法風格。這點，也是晚清學者判斷青銅器真偽的一個重要而又屢試不爽的方法。吳大澂在致陳介祺的一箚中說：

> 陝中作偽者以張姓（俗呼為張鳳眼）為最多。流傳它省不少。其字體一望而知，如《遂啟祺鼎》之類（中二行八九字則真）。敝處專集偽刻拓本一冊，張刻有二十餘種，留以印證。此外無能手。都中亦無偽刻者，何以知之？蓋偶刻一二器，必不熟，必不能肖。迨多刻而熟，其用筆結構自成一格，即力求變化，亦知為一手所作。古器文字有精有不精，體各不同，無相類者。且古人用筆轉折自有生動處，後人摹仿不能得其神理。去年陝友寄來簋拓，索二百金，文曰：「大師小師望作寶尊彝」，乃系張刻。楊實齋堅執以為不偽（實齋為人誠篤，向不以偽器相混），此但觀其色澤字口而不能審其篆體氣息之故。大澂力辨其非是也。⑮

此信說明，當時的收藏家和古董商（楊實齋即陝西古董商楊秉信〔約1831—約

⑭ 參見程仲霖，《晚清金石文化研究——以潘祖蔭為紐帶的全體分析》（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論文，2013），頁122-166。

⑮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吳大澂致陳介祺信箚（稿本）。吳大澂在1887年二月廿六日致徐熙的信箚中也張鳳眼作假一事：「父乙壺器本不古，文則張鳳眼所刻。當時李伯漁得自秦中。其作字，『父』字總不得其法，此造化所限。否則虎賁中郎不可辨矣。近有山左客帶來一鼎，奇貨可居，視其文亦系張刻。」此箚收入吳大澂致徐康、徐熙父子信箚冊，私人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09〕）主要根據青銅器銘文拓本來判斷真偽。此箚約書於1883年，此時，吳大澂對青銅器的銘文辨偽已經有了相當的經驗和自信。不過，大約在九年前任陝甘學政時，他的經驗還沒有如此豐富。1874年八月他曾寄給陳介祺一些青銅器銘文拓片並附上原器目錄，陳介祺在吳大澂書寫的一些器名下寫著「偽」「亦有可疑」「疑」等批語。[116] 可見，陳介祺也是根據吳大澂寄給他的銘文拓片來判斷真偽的。

晚清收藏家由於大量地收集吉金拓片，所以對青銅器的銘文十分熟悉，判斷真偽，目光如炬。當拓片品質不好、不能做出最後判斷時，晚清學者也會觀察原器。王懿榮在致潘祖蔭的信中說：「承示《婦女卣》拓本，敬審器蓋，為青綠所掩，字文不甚完晰，就其筆劃之爽豁者睹之，或洗剔也。此款習見，又不精美，不敢定也。俟見原器後，始曉然也。」[117] 吳雲在致吳大澂的信中也說：「鄙人嘗謂，辨識古器，除卻至劣之品一望而知為偽者，總得目見其器始得定其真贋。」[118] 理論上來說，最理想的方法當然是原器結合銘文拓片一起考鑒。但在實際操作中，觀察原器卻並非那樣容易，因為當需要諮詢異地的鑒定家時，要把原器送去，實在不便，送去拓片徵求意見，才是最為可行的方法。吳雲在己卯（1879）五月廿二日致吳大澂的一箚中說：「茲有鬻古者持古鐘求售，云從楚蜀來，索價甚巨。過雲樓已償值五百金，前路云非千金不售。僕審其篆文，頗精，銘在兩面，與楚良臣鐘正同。篆與王子申（上殘下皿）諸器相類。過雲就質於鄙人，得一言以定棄取。僕因近日作偽者心思奇巧，層出不窮，價目過巨，實未敢遽下斷語（心實以為佳），用將拓本馳上，乞為審示，專盼，專盼。鐘乳如覆螺狀，如鎛鐘甬，已脫落。云雷花紋頗精。因非千金不售，故過雲喬梓遲疑不能決也。」[119] 此時，吳大澂正在河南河北道的任上，吳雲要資詢吳大澂的意見，只能寄銘文拓片。由此可見，以銘文拓片來辨別青銅器的真偽，是當時鑒定使用的主要方法。

---

[116] 此箚亦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稿本），陳介祺注明「甲戌八月吳清卿學使寄」。

[117] 《王懿榮書箚》（上海圖書館藏稿本），頁89。原信箚冊頁無頁碼，此處頁碼系筆者根據冊頁的次序所加。

[118] 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頁192。

[119] 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頁197-1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20世紀的青銅器研究來反觀晚清學者的鑒定方法，可以說其具有極高的水準。商承祚（1902—1991）對陳介祺的眼光大為佩服，認為陳介祺收藏的青銅器無一偽器。[120] 吳大澂所收青銅器中的偽器也很少。

吳大澂研究青銅器的重要著作《窓齋集古錄》（附《窓齋集古錄釋文剩稿》）共收1263件青銅器的銘文。[121] 吳大澂曾說：「余生平好古文字，廣求商周鐘鼎尊彝，積久得二百餘器，多前人著錄所未及。」[122] 也就是說，《窓齋集古錄》中約有一千器是他人的藏品，吳大澂並未全部見過這些青銅器，他所擁有的，是友人贈與或他購買的拓片，他的研究也主要依據這些拓片而進行。

吳大澂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說文古籀補》，備受後世學者好評。[123] 這裡不再重複那些評論，僅想就本文的主題「拓片」來談討論此書。此書大量援引商周青銅器銘文、古璽印文、古幣文、古陶文，吳大澂在自序中專門寫道：「所編之字，皆據墨拓原本，去偽存真，手自摹寫，以免舛誤。至《博古》《考古圖》及薛氏、阮氏、吳氏之書，未見拓本者，概不採錄。」[124] 由於吳大澂的大篆書法功力深厚，所取之字皆由拓本直接摹出，這就避免了前代字書多從摹本輾轉傳摹、字形往往失真的弊病，使得這一著作在字形準確方面達到了空前的水準。[125] 吳大澂本人的收藏有限，如果沒有友人們提供大量拓片，要完成這本字編類的著作也是不可能的。[126]

---

[120] 商承祚說：「（陳介祺）一生收藏的銅器等，不下幾千件，沒有一件是假的。」見商承祚，〈古代彝器偽字研究〉，《金陵學報》，第3卷第2期（1933年11月），頁243。

[121] 俞紹宏，《說文古籀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9。

[122] 吳大澂，〈求賢館藏古器記〉（1893年撰，吳湖帆舊藏稿本）。關於吳大澂的收藏規模，可參見顧廷龍編，《吳窓齋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新近的討論可見白謙慎，〈甲午戰爭後的吳大澂——兼論吳氏收藏的遞傳問題〉，收入《吳湖帆的手和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20-35。

[123] 關於當代學者對吳大澂學術成就方向及其意義的評述，可參見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第3冊，〈吳大澂〉一文。裘先生認為，吳大澂利用出土材料包括拓片進行研究，已經不完全是乾嘉舊法，已經具備了現代學術的若干眉目。

[124]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光緒年間刻本），凡例。

[125] 參見俞紹宏，《說文古籀補研究》，頁39。

[126] 不獨吳大澂，他的友人繆荃孫的金石目錄之學，葉昌熾的石刻之學（《語石》），都是建立在擁有數量巨大的拓片的基礎之上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14年夏，剛剛完成《宋代金石著錄表》並正在撰寫《國朝金文著錄表》的王國維（1877—1927），致信繆荃孫，對彼時的金文拓本收藏和宋代以來的金文研究，做了簡略的評價：

> 近二三月內，作《金石著錄表》，宋代一卷已成。國朝四卷正在具草。又就蘊公所有拓本未著錄者尚有十之四五，蘊公即擬以次印行，亦即歸入《表》內。近時收藏金文拓本之富，無過於盛伯羲之《郁華閣金文》。而蘊公二十年所搜羅，固已過之。前年盛氏拓本亦歸其所有，故其全數除復出外，尚有千數百器，雖世間古物不止於此，然大略可得十之六七。故此次所作《表》，謂之金文之全目錄，亦略近之。比年以來，擬專治三代之學，因先治古文字，遂覽宋人及國朝諸家之說。此事自宋迄近數十年，無甚進步。積古於此事有蓽路藍縷之功，然甚疏陋，亦不能鑒別真偽。筠清出龔定庵手，尤為荒謬。許印林稍切實，亦無甚發明。最後得吳清卿，乃為獨絕。惜為一官所累，未能竟其學。然此數十年來，學問家之聰明才氣，未有大於彼者。不當以學之成否，著書之多寡論也。蘊公繼之，加以龜板等新出文字，乃悟《說文》部目之誤，並定許所謂古文指壁中書，此所謂籀文指漢代尚存之《史籀篇》，此實小學上一大發見，而世尚未之知也。此外有裨於國邑姓氏、制度、文物之學者，不勝枚舉。其有益於釋經，固不下木簡之有益於史也。[127]

在王國維看來，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雖有開創之功，但仍相當疏陋；吳榮光（筠清，1773—1843）的金文著作假手龔自珍（1792—1841），謬誤甚多；許瀚（印林，1797—1866）的金文考釋，無甚發明；至吳大澂，金文研究才有了長足的進步。進入20世紀後，羅振玉（蘊公，1866—1940），利用甲骨文的發現，為文字學開一新境地。而這其中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吳大澂，不但聰明才氣為數十年來之翹楚，也深深得益於那個時代收藏拓片的風氣。王國維信中提到的19世紀最大的金文拓片收藏家盛伯羲，即為吳大澂的好友盛昱（1850—1899）。[128] 而發現甲骨文的王懿榮，是吳大澂的結拜兄弟。甲骨文最

[127]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劄》，下冊，頁1017-1018。

[128]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吳大澂致盛昱信劄四通。其中一通書於1887年冬月初四日，信中提及他收到了盛昱在端午日寫給他的信，信中盛昱詢問吳大澂何時可以石印《全金文》，吳大澂告知此書「尚未成編」。由此可知，吳大澂也曾有編輯《全金文》的計畫，友人們贈予金文拓片以襄其成。只是由於公務繁忙，最終未能如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初的傳播，也多多倚重於拓片之助。對晚清民初的學者來說，拓片在學術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王國維在信中介紹自己的學術活動和評論清代的金文研究時，專門提及盛昱和羅振玉收藏吉金拓片的規模，因為大規模地收藏拓片早已成為晚清學界的共識和學術研究的基石。

鳴謝：

本文準備的過程中，得到了薛龍春、秦明、陳碩、陳冠男、陳恬敏、楊崇和、孫中旺、陸豐川和兩位名匿名審稿人的幫助，在此謹表誠摯的謝意。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明）李日華
《紫桃軒雜綴》，明末刻康熙李瑁重修本。
（清）王同愈
《王同愈集》，顧廷龍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清）王懿榮
《王懿榮集》，濟南：齊魯書社，1999。
〈題石印本《散氏盤》拓本〉，收入《中國嘉德2005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圖錄，2005年5月15日，北京，編號1701。
《王懿榮書劄》，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清）江標
《笘諺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稿本。
（清）朱彝尊
〈跋漢華山碑〉，收入《曝書亭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影印本。
（清）李玉棻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第12冊，頁1062-1132。
（清）吳大澂
〈致吳雲信劄〉，收入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第1輯，〈吳大澂檔〉，頁237-238。
〈求賢館藏古器記〉，1893年撰，吳湖帆舊藏稿本。
《說文古籀補》，光緒年間刻本。
〈致盛昱信劄〉，北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稿本。
〈致潘祖蔭信劄〉，北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稿本。
〈致王懿榮信劄〉，長春：吉林省博物館藏稿本。
〈致陳介祺信劄〉，北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稿本。
《吳愙齋（大澂）尺牘》，謝國楨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影印本。
（清）吳雲
《兩罍軒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光緒甲申刊本。
（清）汪鳴鑾
〈致吳大根信劄〉，吳湖帆舊藏稿本。
（清）沈樹鏞
《漢石經室金石跋尾》，上海圖書館藏稿本。點校本收入何紹基、沈樹鏞《〈東洲草堂金石跋〉〈鄭齋金石題跋記〉》，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翁同龢
《翁同龢日記》，上海：中西書局，2011。
（清）莫友芝
《莫友芝日記》，張劍整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清）梁章鉅
《退庵所藏金石書畫跋尾》，收入盧輔聖等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第9冊，頁991-1115。
（清）曹溶
《靜惕堂詩集》，雍正年間刊本。
（清）張佩綸
《澗于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影印本。
（清）康有為
〈廣藝舟雙楫〉，收入《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下冊。
《康南海自編年譜》，收入樓宇烈整理，《康有為學術著作選•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92。
（清）陳介祺
《簠齋尺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影印本。
（清）葉昌熾
《語石、語石異同評》，柯昌泗評，北京：中華書局，1994。
《緣督廬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
（清）潘祖蔭
《潘文勤公書劄》，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潘文勤公與吳窓齋信劄》，蘇州：蘇州博物館藏顧廷龍抄本。
（清）繆荃孫
《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序》，收入新文豐出版社編，《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第1輯，第26冊。
《繆荃孫全集・日記（1）》，張廷銀、朱玉麒主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清）顧文彬
《過雲樓日記》，蘇州市檔案局、蘇州市過雲樓文化研究會編，上海：文匯出版社，2015。
〈過雲樓日記〉，李軍整理，收入蘇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蘇州史志資料選輯》，第37輯（2011），頁92-119。
顧廷龍校閱
《藝風堂友朋書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人論著

王敏輯注

1990 《北京圖書館藏善拓題跋輯錄》，北京：文物出版社。

Wang, Min, ed. and anno.

1990 *Beijing tushuguan cang shanta tiba jilu* (Records of Colophons to the Refined Rubb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Beijing Librar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白謙慎

2013 《吳大澂和他的拓工》，北京：海豚出版社。

2015 〈甲午戰爭後的吳大澂——兼論吳氏收藏的遞傳問題〉，收入《吳湖帆的手和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20-35。

2015 〈晚清文物市場與官員收藏活動管窺：以吳大澂及其友人為中心〉，《故宮學術季刊》，33卷1期，頁399-441。

2015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臺北：石頭出版社，2005；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Bai, Qian-shen

2013 *Wu Dacheng he tade tagong* (Wu Dacheng and His Rubbing Workers), Beijing: Dolphin Press.

2015 "Jiawu zhanzheng hou de Wu Dacheng: Jianlun Wushi shoucang de dichuan wenti (Wu Dacheng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Also with Discussions of the Related Issues of the Passage of the Wu Family Collection)," in Shanghai Museum, ed., *Wu Hufan de shou he yan* (The Hands and Eyes of Wu Hufan),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pp. 20-35.

2015 "A Preliminary Study about the Antiquities Market and Collecting Activities of Offici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3, no. 1, pp. 399-441.

2015 *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ardcover edition, Taipei: Rock Publishing, 2005;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仲威

2014 《碑帖鑒定概論》，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Zhong, Wei

2014 *Beitie jianding gailu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noisseurship of Model-Book and Stele Rubbings),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ress.

任曉煒

2009 《緣督廬中的金石世界》，杭州：中國美術學院碩士論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n, Xiao-wei
2009 *The Jinshi World of the Yuandu Studio*, Master's Thesis, China Academy of Arts, Hangzhou.

李文杰
2010 〈總理衙門章京的日常生活與仕宦生涯——《懲齋日記》與楊宜治其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0期,頁51-95。

Li, Wen-jie
2010 "The Daily Life and Official Career of a Zongli Yamen Secretary: *Chengzhai Riji* and Yang Yizhi),"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 70, pp. 51-95.

松丸道雄
2005 〈陳介祺與蘇氏兄弟——關於陳氏的古董的搜集〉,收入孫慰祖等編著,《陳介祺學術思想及成就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頁340-354。

Matsumaru, Michio
2005 "Chen Jieqi yu Sushi xiongdi: Guanyu Chenshi de gudong de souji (Chen Jieqi and the Su Brothers: On Chen's Antique Collecting)," in Sun Weizu et al. eds., *Chen Jieqix ueshu sixiang ji chengjiuy antaohuil unwenji*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Chen Jieqi's Scholarly Thoughts and Accomplishments), Hangzhou: Xiling Seal Society Press, pp. 340-354.

邵義
2010 《過去的錢值多少錢:細讀19世紀北京人、巴黎人、倫敦人的經濟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o, Yi
2010 *Guoqu de qian zhi duoshao qian: Xidu shijiu shiji Beijingren baliren Lundunren de jingji shenghuo* (The Worth of Money in the Past: A Close Reading of the Economic Life of People in 19th-Cenutry Beijing, Paris, and Londo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

俞紹宏
2008 《說文古籀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Yu, Shao-hong
2008 *Shuowen guzhou bu yanjiu* (Studies of *Addenda to the Ancient and Zhouwen Graphs Recorded in the* Shuowe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施安昌
1997 《漢華山碑題跋年表》,北京:文物出版社。

Shi, An-chang
1997 *Han Huashanbei tiba nianbiao* (Chronology of the Colophons to the Rubbings of the Mount Hua Stele from the Han Dynast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孫殿起
2010《琉璃廠小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Sun, Dian-qi
2010 *Liulichang xiaozhi* (Assorted Records of Liulichang),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曹建
2005《晚清帖學研究》，天津：天津美術出版社。
Cao, Jian
2005 *Wan Qing tiexue yanjiu* (A Study of Late Qing Model Calligraphy), Tianjin: Tianjin Fine Arts Press.
商承祚
1933〈古代彝器偽字研究〉，《金陵學報》，第3卷第2期，頁1-52。
Shang, Cheng-zuo
1933 "Gudai yiqi weizi yanjiu (Studies of the Faked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Ritual Bronzes)," *Nanking Journal*, vol. 3, no. 2, pp. 1-52.
程仲霖
2013《晚清金石文化研究：以潘祖蔭為紐帶的群體分析》，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論文。
Cheng, Zhong-lin
2013 *Wan Qing jinshi wenhua yanjiu: Yi Pan Zuyin wei niudai de qunti fenxi* (A Study on Jinshi Culture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With a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ircle of Pan Zuyin), Ph.D. Dissertation,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張宏傑
2015《給曾國藩算算帳：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京官時期）》，北京：中華書局。
Zhang, Hong-jie
2015 *Gei Zeng Guofan suansuan zhang: Yige Qingdai gaoguan de shou yu zhi (jingguan shiqi)* (Do Accounts for Zeng Guofan: The Incomes and Expenses of a Qing Dynasty Senior Official [Capital Period]),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張德昌
1970《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Chang, Teh-chang
1970 *Qingji yige jingguan de shenghuo* (Life of a Court Offici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Study of Pers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楊洪昇
2008《繆荃孫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Yang, Hong-sheng
2008 *Miao Quansun yanjiu* (A Study of Miao Quansun),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 Publishing House.
裘錫圭
2012 〈吳大澂〉，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第3冊。
Qiu, Xi-gui
2012 "Wu Dacheng," in *Qiu Xigui xueshu lunwen ji* (Collection of Qiu Xigui's Scholarly Writing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vol. 3.
薛龍春
〈上圖藏阮元致陳文述十四劄考述〉，未刊稿。
2007 《鄭簠研究》，北京：榮寶齋出版社。
Xue, Long-chun
"Shangtu cang Ruan Yuan zhi Chen Wenshu shisizha kaoshu (Studies of Ruan Yuan's Fourteen Letters to Chen Wenshu in the Collection of Shanghai Librar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7 *Zheng Fu yanjiu* (A Study of Zheng Fu), Beijing: Rongbaozhai Press.
顧廷龍
1965 《吳愙齋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
Gu, Ting-long
1965 *Wu Kezhai xiansheng nianpu*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Wu Dacheng), Taipei: Wenhai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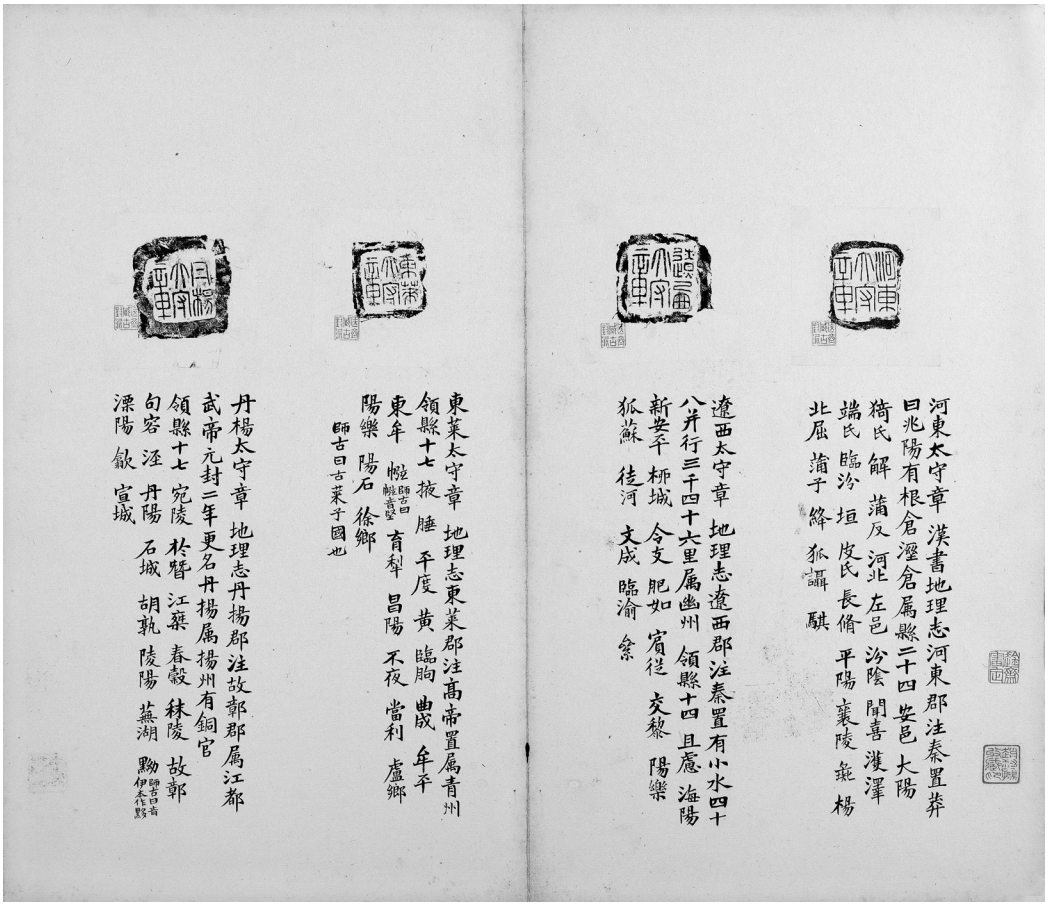
圖版出處

圖1　吳大澂考釋簠齋藏封泥拓片 共5冊，111開，每開31x36釐米 楓江書屋藏

圖2　吳大澂臨《散氏盤》尺寸不詳 蘇州圖書館藏

圖3　黃士陵為吳大澂刻《窓齋所得金石》引自《看似尋常最奇絕：黃士陵書畫篆刻藝術》(臨時澳門市政局畫廊，2001)，篆刻部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河東太守章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注秦置莽曰兆陽有根倉涇倉屬縣二十四安邑　大陽　猗氏　解　蒲反　河北　左邑　汾陰　聞喜　濩澤　端氏　臨汾　垣　皮氏　長脩　平陽　襄陵　絳　楊　北屈　蒲子　絳　狐讘　騩

遼西太守章　地理志遼西郡注秦置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屬幽州　領縣十四　且慮　海陽　新安平　柳城　令支　肥如　賓從　交黎　陽樂　狐蘇　徒河　支成　臨渝　絫

東萊太守章　地理志東萊郡注高帝置屬青州　領縣十七　掖　腄　平度　黃　臨朐　曲成　牟平　東牟　帷師古曰帷幔書室　育犁　昌陽　不夜　當利　盧鄉　陽樂　陽石　徐鄉　師古曰古萊子國也

丹楊太守章　地理志丹楊郡注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楊屬揚州有銅官　領縣十七　宛陵　於瞥　江乘　春穀　秣陵　故鄣　句容　泾　丹陽　石城　胡孰　陵陽　蕪湖　黝師古曰音伊太作黝　溧陽　歙　宣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　吳大澂考釋簠齋藏封泥拓片　共5冊，111開，每開31x36釐米　楓江書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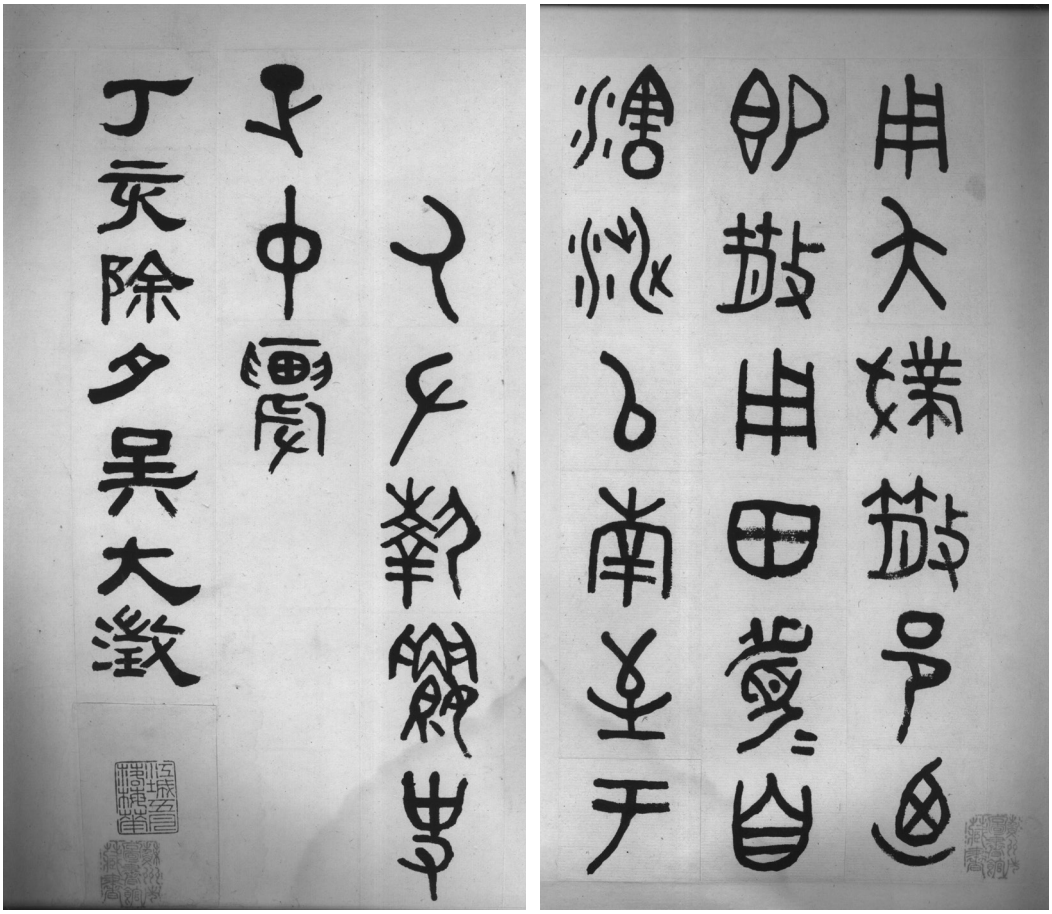


圖2 吳大澂臨《散氏盤》 尺寸不詳 蘇州圖書館藏



圖3 黃士陵為吳大澂刻《窓齋所得金石》 引自《看似尋常最奇絕：黃士陵書畫篆刻藝術》（臨時澳門市政局畫廊，2001），篆刻部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irculation of Rubbings and the Late-Qing Art and Scholarship

Bai, Qian-shen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um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major means of circulating rubbing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such as gift offering, purchase in the market, exchange and fund-raising for site visits.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such means of circulating rubbings enabled *jinshi* (epigraphic) scholars to go beyond geographical limitations and collect rubbings of bronze and stone objects on a larger scale. The production of rubbings and the sharp rise in the scales of collection provided a material base for the bloom of the stele school of calligraphy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paleography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Keywords: circulation of rubbings, site visits to steles, rubbing production, stele school of calligraphy, paleograph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